

# 目 录

## 经济篇

- 1、喀喇沁旗黄金开采的由来与发展……………白 音 (1)
- 2、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黄金群采录……………侯 广 (6)
- 3、赵蔚文和五家煤矿……………姜兴东 (11)
- 4、我所知道的五家煤矿……………张宗义口述 张勇整理 (18)
- 5、解放前公爷府的商业……………张文学调查整理 (21)
- 6、昌盛一时的王爷府商号……………木 斯 (25)
- 7、万木逢春喜峥嵘——旺业甸的经济沿革……………赵振德 (28)
- 8、李贵和“大德源”……………于成龙 (34)
- 9、永义合药店……………张云岫 (39)
- 10、杏林春药店……………朱家骥 (45)
- 11、解放前喀喇沁旗邮政……………王殿章 王文杰整理 (47)
- 12、山嘴子焰花爆竹……………张云岫 (50)
- 13、公爷府最早的李家油坊……………解 生 (54)
- 14、高粱秆子店“画棚子”由来……………王守智 (56)

## 医药篇

- 15、解放前喀喇沁旗中医中药概况……………李万林 (58)
- 16、喀喇沁旗蒙医蒙药……………李万林 阎桂芳 (60)
- 17、中医郑宗汉……………郑瑞峰 (62)
- 18、中医张景参……………王书平 (64)
- 19、名医世家张朋……………王书平 (66)
- 20、中医田向阳……………张云岫 (68)

- 
- 
- 21、外科中医于凌旺……………朱家驥 (70)  
22、中医高新……………高 克 (72)  
23、王爷府“公医”诊所……………木 斯 (75)

### 人物记

- 24、我的舅父——博仁特古斯……………汪云生 (78)  
25、英名永存……………张云岫 (88)  
26、世袭“引路侯”……………邢复昌 木 斯 (96)  
27、杨时芳兄弟……………木 斯(100)

### 社会篇

- 28、红帽子起事……………王书平 张云岫(103)

### 宗教篇

- 29、普通寺……………阎桂芳(111)  
30、锦山镇清真寺……………马贵祥(116)  
31、洞山庙的来历……………王书平(119)  
32、喀喇沁旗寺庙简况  
……………木 斯 张云岫 郑瑞峰 张 勇整理(121)

---

---

# 喀喇沁旗黄金开采的由来与发展

白 音

喀喇沁旗的黄金矿区是在东部十家、楼子店、官家营子三个乡所属的十一个自然村的境内。此地山峦起伏，沟壑错纵。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区，老革命根据地。

## 一、解放前的土法采金炼金

喀喇沁旗的黄金开采，是从清代开始的。据《清实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甲辰，停蒙古喀喇沁旗地方开采金矿，从热河都统英隆清也。”由此可见，喀喇沁旗早在清道光年间就开采过金矿。黄金资源比较丰富，据十家乡老人介绍，过去在官家营子乡一带，把老采矿井称之谓“七分二”、“七分七”、“八分四”等矿名，含意是指在六十斤矿石中含金量而得名。采金历史悠久，至今有一百五十多年，所以，当地农民就有采金的传统和习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就有人在十家鸡冠山一带采金。据十家老人介绍，俗称“王大肚子”的农民，在林营子、北山根、山湾子地区，组织一百五十多人采金，打过十个矿井，开采九年，采金约五千多两。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京城派徐道台（名润，字雨之，号愚斋。经李鸿章推荐，被慈禧太后认为义子，赐五品道台。）采塞外赈济，到敖汉旗金厂沟梁和喀喇沁旗长皋、安家营子一

带，发动群众采金自救。当时喀喇沁旗的采金点有漏缝砬、金洞子沟、老米囤、八大把、西大线、东大线等矿点，土法采金炼金。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热河都统松寿奏：“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贡桑诺尔布，呈请将本旗巴达尔胡川金矿与荷兰商人白克耳集资开采，以裕蒙藩生计。”下部议。寻奏：“以该郡王原将右翼全旗指给‘逸信公司’开办金矿，经部饬划清界限，不得包括全旗。嗣虽豫指鸡冠山一处，仅出自该郡王一面之意，‘逸信公司’是否允愿，尚难豫定。若遽允荷兰商人白克耳在该旗巴达尔胡川开办金矿，将来难保不滋谬葛，拟请暂缓置义。”从之〔赤峰市地方志概述篇（初稿）83页〕。据十家乡七十多岁老人白明山、侯廷先、侯明生等介绍，当时赤峰洋行（逸信公司）的陈明轸、杨凤皋、李金侠等，在鸡冠山、南偏道子沟一带，组织十二个把，一百多人，开金矿十年左右，采金三千多两。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陶师爷从敖汉旗金厂沟梁来喀喇沁旗，组织一百四十多人，在大水清东段四十米线上打竖井，开矿三年，采金约一千五百多两。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十家当地人王廷、王兆、白万藻开采大陵前矿点（大陵是指清圣祖玄烨之五女和硕端静公主之陵墓），组织一百多人，三个把，开金矿一年多，采金八百多两。

一九四〇年，伪满洲国开采金矿。宁城县苏县长派高秀峰担任经理，组织五十多人，在长皋、大陵前、夹皮墙几处开矿六年，采金约七百余两。并收购群众自采的成品金。同时，日本人在十家矿区进行了资源普查，勘查资料记载：十家矿区金属保有量为20、23吨。

十家一带的群众善于土法采金炼金。当时采金炼金的工具有几十种：铁钎、尖镐、钢钎子、大铁锤、小铁锤、铁耙子、小筐箩、辘轳、柳罐、木桶、铁皮桶、木制水溜子、木簸箕、水缸、搪瓷盆、砂碗、铅罐、铅丝、铅板、铜板、大铁锅、铁钳子、铁钩、吹管、刷子、土火炉等。采金炼金的几个环节：打矿石、排水、背矿石、碾石粉、打溜子、清金、炼金、烧大桶、破碎、硫酸加热、提银等。具体的方法是：

(1) 打矿石（采矿）。按照矿脉开竖井或斜井，人工用钢钎打眼放炮。当时的炸药是自制的，熬火硝，烧麻杆炭，买硫磺，兑制成黑色火药。导火线也是自制，用毛头纸条卷上火药，再用高粮秸皮（去瓢）卷起包扎即成。

(2) 排水（抽水）。竖井用辘轳、柳罐排水，斜井修上台阶，每二、三层台阶站一人，传递水桶，提水排水。

(3) 背矿石（提升）。斜井用小筐箩肩背，从台阶走上；竖井用辘轳、柳罐提升到地面。

(4) 碾压石粉（选矿）。先用锤子把矿石砸成小块，放锅里炒干，再用碾子压成砂面。

(5) 打溜子（淘金，选矿厂浮选）。将砂面石粉陆续放入木制水溜子，用水冲下，沙出金粉。水溜子上的金粉即可用炼金炉熔为成品金。

(6) 清金。做一个一尺六寸长，一尺四寸宽的椴木簸箕，把砂面倒入，不断晃动，窜出砂粒，剩下的就是光金，放砂碗或铅罐炼出成品金。

(7) 炼金（冶炼）。用砂碗（小量的）或铅罐（大量的）坐于土火炉上加热，炉内烧自制的白炭（杏木烧制）。先在砂碗内放入硼砂，熔化后涂于砂碗内面上，保护砂碗。再将金粉用单层纸包上放入砂碗内加热熔化，包纸是为了防止金粉的飞溅。待

熔成金水后，用吹管将杂质吹到碗边，用铁钩贴出杂质，清出杂质后，倒入碾窝或铸铁槽内，即可制成金锭或金条。

(8) 烧大桶（氰化尾矿）。淘金时，水溜子冲下来的泥砂中还含有少量金子，用烧大桶的办法提出来。备大缸一个，把砂泥放入缸内，兑入适量的洋碱（即氰化钠），同时放入铅丝，经十几个小时后，金子就镀到铅丝上，然后用水清洗，再把铅丝放入铅罐内熔之，制成含铜、含银的低品位的金块。

(9) 破碎。将低品位的金块破碎成小金粒或金片。用大锅一口，放入一定量的水待用。将金块用砂碗或铅罐熔成金水，锅上放一柳条刷子，将金水从柳条刷上倒入锅内水中，这样金水就能变成细小的金粒或金片落于水中，捞取后提纯。

(10) 硫酸加热（清银、清铜、提纯）。用搪瓷盆一个，放入硫酸水，把破碎的金粒、金片放入硫酸液中，同时加入百分之二十五的银子，把搪瓷盆放土火炉上加温，待硫酸液蒸发快干时，用开水冲洗金粉，可冲几遍，铜随硫酸蒸发跑掉，银流入冲洗的水中，剩下的土黄色金粉，放砂碗或铅罐内熔化，倒入铁槽内制成金条。

(11) 提取白银。硫酸加热冲洗的水中含银，在水中放入铜板一块，经过十多个小时，白银全部附着于铜板上，取下白银粉，滤去水分，放砂碗炼之即成银锭或银条。另一种办法是，在冲洗水中放入青盐粉（即氯化钠），沉淀后，滤去水分，炼之。

群众用土办法也能提炼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纯金。

## 二、解放后的探矿采矿

解放后，旗人民政府于一九四七年、一九五七年两次组织群众用土法采金、炼金，收益均不大，被迫停产。

一九七三年五月，原楼子店公社玉皇庙大队方义俊组织群众

在大水清一号矿脉一带打机械井灌溉农田，在井中发现了含金矿石，经化验，含金九十克。旗革命委员会决定，由小牛群青峰煤矿办附属矿，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在安家营子一带开竖井采金，命名为安家营子金矿。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安家营子金矿转为地方国营，改名为大水清金矿。

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九年，喀喇沁旗的黄金开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期间由探矿到正式生产；由原始的土法采金逐步地采用机械化设备开矿、选矿。国家和集体一起上。采金工人从少到多，设备由土变洋，房屋、公路、电力从无到有，为我旗黄金生产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〇年以来，黄金生产进入了兴盛时期。黄金产量逐年上升，利润连年增长，经济效益大为提高。一九七六年黄金产量六百六十两，一九八〇年增加到六千三百多两，五年增长了近十倍。到一九八四年突破了万两大关，进入了国家万两县的行列，占全国万两县的第十位。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冶金厅和赤峰市人民政府的奖励。

（这个材料是根据《喀喇沁旗黄金志》和《大水清金矿矿志》整理的）

## 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黄金群采录

侯 广

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有悠久的黄金群采历史。利用民间传统的古老工艺手段采金炼金，据传早在道光年间（至少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据当地人说，十家大陵前曾有一块大白火石（实为含金品位很高的金矿石），当地人见这块石头质地奇特，一个姓汪的农民砸下一块，拿到哈达街（赤峰市）华林家（一个收购金银者）去“试色”，结果发现含金量极高，有“九个色”。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你砸一块，我敲一块，不过几天工夫，这块大石头不复存在了，在这块大石底下，人们发现了金砂子，也被一挖而光。后来这件事被喀喇沁王爷知道了，以大陵（清康熙玄烨之五女和硕端静公主陵墓）前不准动土开矿为由，派人处罚了姓汪的农民四百吊钱。当地百姓出于义气，大多把得到的金矿石和金砂子给了姓汪的抵偿其罚金。因此，这里有“金子不发头一家”的说法，此地也便以“四百吊”留名。此后，从口里来了几个逃避官债的穷人，发现了这里的金矿资源，组织人开采，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人们说的“早晨要饭，晚上骑马”，就是关于发黄金财形象的谚语。在十家乡长皋村及官营子雁翅沟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采金的传说，并有许多的以含金量多少命名的金矿点遗迹，如“七分二”、“九分七”、“八分四”；也有以采金组织或有关轶闻得名的，如“八大把”、“老米囤”、“七十二盘锅”、“樊三天”等等。

当时的民间群采黄金，亦称私矿。有比较松散的组织形式，



称作“把”，“把”再派生“股”，有人股（出人力）、家具股（提供采金器具）、财股（出资金），还有空股（负责组织者），也叫“班头”。集股成把，联合采金，所得按股分成。在民采的基础上，官府开办所谓官矿，继起于民采之后。据《清实录》记载，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官方在十家满族地区开采金矿，“从热河都统英隆清也”。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鸡冠山一带有个俗名“王大肚子”的人，在林营子、北山根、山湾子等处，曾组织过一百五十多人采金，历时九年，开凿矿井十个，采金达五千余两。另有个名叫钱英的班头，在十家乔麦地一带找到一段金线，长约一华里。这条金线上的金矿石含金品位极高，说“三碗面子，两碗金子”，虽不无夸张，但必竟是个富矿。见矿的地方，掌面水太大，无法做活，而且有生命危险。眼看着金子被大水淹没，“哭三天”由此而来。光绪十七年（1891年），徐润（字雨之、号愚斋。经李鸿章荐为慈禧太后之义子，官居五品道台）自京城来塞外赈济饥民，在十家长皋一带曾发动群众采金自救。为了解决地下水过大问题，他组织了二、三十个把的力量，并革新了提水办法（当时采矿设备简陋，一般提水用水斗子），在金线中段开出一条斜巷，开凿出七十二级台阶，每阶上放置一口贮水的大铁锅，逐级从锅中把地下水提至地面，故此处有“七十二盘锅”之称。当年主要采金点有漏缝岭、金洞子沟、老米囤、八大把、东、西大线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赤峰洋行（逸信公司）的陈明轸、杨凤皋、李金侠等在鸡冠山、南偏道子沟组织了一百多人，十多个把，历时十年左右，采金三千多两。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从放汉旗金厂沟梁来了一位陶师爷，组织了一百四十多人，在大水清东段四十米线上打竖井，开矿三年，采金一千五百余两。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十家当地人王廷、王兆、白万藻组织三个把一百多人，在大陵

前开矿，历时一年多，采金八百余两。1940年，满洲国宁城县苏县长，委派高秀峰为经理，在长皋、大陵前、林营子夹皮墙等处开金矿，历时六年，采金七百余两。据知情人讲，当时大陵前地表有明金、沙金，以前就有人采过，最多采金者达到三百多人。为高秀峰采金的群众受到严格监管，采金人员所采的金矿石、金矿沙不准往家带，放在金矿局统一保管，按2：8分成，个人所得部分全数卖给金矿局，每两作价180元（若私卖每两800元左右）。金矿局不给现钱，只发灯油、咸盐之类的实物。据有案可查的记载粗略统计，从满清时代到解放前，十家满族乡民间群采黄金，约有一万一千多两，参加采金群众达一千多人，满族占多数。

在长期的采金活动中，广大群众探索总结积累了丰富的采金实践经验。根据曾参加当年采金者侯玉峰忆述简要归纳如下：

探矿方法：1、探线金（脉金）。由于当时没有探矿仪器，除了偶然的发现外，仅凭肉眼鉴别。主要看地表上的砂石，有金矿的地表上多有“龙王沙”（黄铁矿）。探矿者掘开浮在最上面的紫色普通沙子，便可见到龙王沙子。有时金矿石会暴露出地面，当地人称之为“喷嘎拉”（喷出岩），这就是所谓明金，挖掘下去便有金矿。2、探河金（沙金）。“山上有线脉，山下有河金”。根据这个规律，人们在山上的“坡卯趟”（山坡上被雨水冲刷而成的一级级的山窝窝）中取工沙，一般含金的工沙呈黑色。然后将工沙集中起来用清水泼淘，发现大粒的明金取出，看不出的用簸箕摇。3、鉴别含金量。将砸碎的矿石或淘出的金沙子研磨成粉末，再用水搅一搅（沙一沙），淘出沙子杂质，剩下的是金子。

采金方法：由于受当时生产条件的限制，传统的采金方法十分落后，效率低下。1、采河金。“河金也有线”，“金子抓河底”。采金者先将河中金线上的泥沙清除，找到河底，贴河床底部有一层沙子，再清除这一层沙子，才见沙金。2、采脉金。

采这种金矿石更是一种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所用的工具主要是铁钎、镐头、鏊子、钎子、铁锤，后来用上了炸药（多是黑药，以柳木炭、销酸钾、硫磺自己配制）。巷道照明多用麻油灯（以铁皮特制的灯壶）。由于井下通风条件不好，有的矿井油灯无法照明。如长皋大线上曾开过一口一百米深井，由于水大，憋灯，就放弃了，此井至今尚存。

炼金方法：第一步是“选矿”。方法是先将矿石破碎，破碎前把金矿石放在小火炕（专为冶炼矿石盘砌的，上铺铁皮）上加温烘干，使金矿石松脆易于破碎。砸碎，用碾子压成碎面。然后将“碎面”过溜子（溜子是用榆木做的，长六至七尺，宽一尺四寸，有一定角度的斜面），把矿石面子加水，用铁片做的小耙子来回搅动，随着水流的冲击，比重较小的沙石随水冲去，含金子的沙子则附在溜子上，这时候再用刷子刷下，用木簸箕（一般为椴木做的，以平泉产品为好，质薄而轻）摇、沙，剩下的就是“毛金”（精金矿）。第二步是化金（冶炼）。一般用砂碗或铅罐。砂碗先在火上锻烧（如有裂痕便不能用），再放入硼砂炼，可以使砂碗结实坚固。炼金者自己盘砌炼金炉子，炉壁以沙子掺黄土抹成，可耐高温。燃料或用“白炭”（杏木挖瘩烧成的炭），或用焦子（焦炭），也有用猴头沟的硬煤的。每次只炼一个砂碗，每个炉子寿命可以使用十多次。化金子时，要看“火候”，冒绿烟证明有杂质（铜），直到炼到液体不翻花（一动不动），才算“化足了”。将化足了的金水倒在预先挖好的长方形小槽里，冷却后就成了“金条”，倒在碌碡的轴碗里（事先要烤热并抹点油），就成了“金锭子”。土法炼金是较为复杂的技术，不是所有采金者都会做的。因此，许多不会炼金的人请人家炼金，除给一定报酬外，还要管饭，帮助人家折腾出“毛金”。炼金人有时也借给别人炉子用。炼过几次金后，可以将废炉子砸巴砸

巴，连同地上、房上、墙上以及使用家具上的粉屑甚至炉灰中都可以提炼出一点金子来。

追溯解放前一百多年的民间群采黄金活动，可以看出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宝贵的黄金矿产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滥采乱挖，个人私炼，资源损失惨重。除了管理上的混乱，掠夺式的开采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外，采金群众的生命财产，合法权益也根本得不到保障。传闻十家长皋有个叫王一宝的采金人，意外地在—个老采的柱脚头上采了点品位较高的矿石，被金矿局的头儿给逼要去了。后又有人说他的长子王志弄了两口袋半金沙子。这个莫须有的传言让—伙山贼知道了，就砸了他家的“明火”。王的媳妇被抓住，放在锅腔子上烧烤，直到两个乳房流油，逼她交出金子，半月之后，她就死了。为了金子死于非命的，何止这一家！十家有个“金饭碗”，但在解放前人们却守着这个“金饭碗”祖祖辈辈受穷。正如古人说：“淘金老汉饿断肠！”

## 赵蔚文和五家煤矿\*

姜兴东

赵蔚文，字豹臣，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号斐然，行五，一般称呼为五东家，绰号“赵五皇上”。当时，距五家煤窑五华里的旺甘池，有位人称宋八爷的，结交私官两面，欺压邻里，独霸一方，无人敢惹，却为一方之害。后经赵蔚文出头，与宋较量，官司直打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手里，才将宋告倒。大快人心，人们给赵送了个绰号叫“赵五皇上”，意思是除了赵蔚文无人敢斗姓宋的。

赵蔚文有三子，长子赵丰亨过继其三哥；次子赵丰利，三子赵丰贞，土改后，一奔承德，一走林东，其母遂去。走后与老家音信不通，详情不明。

赵蔚文兄弟五人，性格各异。长兄勇猛，性喜好斗，略会武术。在当初争矿时和其父一起被对手打死，无后代；二哥赵尚文，好闲好吃，每天有酒喝、有肉吃即可，可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其子遗一子，木匠，在赤峰工作，与其母王庆芝现住本旗三道营子；三哥赵殿文，好动，吃常斋素口。成年后赶大车，人称“三老板子”。土改后，卖瓦盆为生，活七十死去，无后代；四哥赵喜文，喜阿谀奉称，言谈富贵，有一种盛气凌人之概，惹事生非。无后代。曾与邻居牛家争吵，与妻打死牛家父子，人称“赵四阎王”。土改前病死，其妻被我政府镇压；赵蔚文本人则与其兄长不同，谦逊待人，从不自大，“不会什么”成其口头

语。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于婚丧嫁娶，慷慨援助，从不索还。佃户、煤工或其他贫困之户，即使管事的不容之事，只要求到他的面前，亦令完结无事。有见解，有魄力，遇事不慌，从容处理不乱。举其二例可以证明：与宋八爷对斗时，宋之靠山有赵、崔两个旅长(宋的干儿子)，黑马队土匪常驻宋的院内，声势吓人，无人敢惹。赵蔚文则毅然迎其锋，终于除患，为人称颂。另一事，智慧超人。伪满时曾抓其两三次，均能安然脱险而去。在这方面有两种说法：一是其人大孝。早晚侍奉老母从不间断，即是妇女辈亦不许偷闲，凡不到母亲房者，他是严加叱责。北京有一位大喇嘛爷，每年来两次，来到即住在赵家。据说，大喇嘛是他母亲在北京打官司时，得其援助才得“龙票”到手。所以，大喇嘛一来，竭力孝养，从无异言。二是，五家南二道营子有一羊信，其人大孝，无论一天如何劳累，必让其母亲吃饱得到欢心。又会占卜之术。后来赵蔚文便将羊信和其母请到赵家，待如上宾，朝夕盘桓。据说，赵之脱险均赖羊信提前告知。这个事不一定属实，但赵家养着羊信确有其事。赵蔚文金钱、家庭全不留恋，决心远去，走时又不与家人商讨，走后更音信杳然。日本鬼子多次搜查，坐待多年，均未能得到端倪。迄至今日，其人下落生死不明。有人说他的脱险和羊信占卜有关，都不可信，但其智力过人是事实。

又有次，土匪纠集多人将其围困在家，赵蔚文即令人将土匪分散多处热情招待，暗暗命人预备马匹在墙外等待，自己便与匪首携手迎进里院，乘土匪不注意之机，他便从墙跳出，乘马扬长而去，到楼子店把驻兵请来，才将土匪轰跑。如果没胆量，难能从容得当。

赵家的宅院，分里院和外院。里院正房十间，出檐抱厦，是赵蔚文住宅。东厢房五间是小厨房，西厢房五间，是小客厅，招待

至亲和上宾。

第二栋十间，为其三哥赵殿文住宅。东厢房五间为外伙房，招待一般亲友。西厢房五间为书院，为赵家各屋子女读书之处。

靠西北角第一院正房七间，为大东家住宅，因大东家已不在，所以也叫大寡妇院。西厢房五间为伙房和仓库，东厢房五间为伙房。

第二院为其二哥赵尚文住宅。正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分为伙房、仓库等用。设南北两大门，南门在里院南，北门在外院外面。

靠西南角里院外，叫“独一处”，也叫小西院。正房七间，后嫌低矮，将东间改为一大间，建两层小楼。东厢房五间住佣人，西厢房五间为伙房仓库。五个院落都是小瓦屋顶，木料全是松木。

外院南房二十间，住车夫、佣人和作大伙房。东厢房十五间厂棚，供喂养牲畜和车辆存放。西有二十间仓房，存放粮食。

外院北门外有“大柜”一处，附有杂货铺，号“东裕成”。账房先生张惠风。一切收支除大项钱财在“里柜”以外，其余均由“大柜”掌管。

传说，道光年间，有人在五家山上发现一群黑天鹅，每日出落在山头，日落即飞去。从而引起人的兴趣，追赶天鹅，查其究竟。即至山顶，天鹅不见，而是一些明亮的石头，取回来能烧火做饭，才逐渐被人重视。这个古老的传说无从查考。当时，此山是茂密的森林。多数是从关里、山东、山西来的人，谁的人多力量大，谁就开辟一块挖煤。此后，争地争山不已，互不相让，日有伤亡。到咸丰末年(1861年)，赵蔚文之父携家带眷来此。因其略会武术，为了争夺此山连年殴斗，终于在一次争夺战中，赵蔚文之父和其长兄被人杀死。夺山无望，生活无路，其母领二、

三、四三个儿子讨饭奔上北京告御状。目的是为丈夫、儿子申冤，如果官司打赢了，也是谋生的一条出路。当时的社会打官司也是不容易的，孤儿寡母，无钱无势，在北京奔波了数年之久，毫无门路可寻。后来在大雪天，母子饿冻倒在喇嘛寺门前，正遇大喇嘛上朝归来（咸丰皇帝替僧），将其母子救回寺内。以后，就住在寺内扶侍大喇嘛爷，乘扶侍之际，哭诉于大喇嘛，蒙其怜悯，上朝带控。延半年之久，才将“龙票”\*发到手。这时五东家出生于北京。又待了些日子，才携带四子回到五家。找官府处置了对手，开始了自己营业，五家成为赵氏矿山。“龙票”的年号是光绪十九年，即为赵家独自开采的年限。开采之日起，金山就分成前窑后窑，计大小矿井各十余个。有巡查煤矿的二十余人。做活有把头，把头包到手后，再找人干。到民国十年为开采全盛时期，人数达两千余人，日产量达六、七百吨。销售面东达黑水、敖汉，西达围场、滦平，北达林东、林西，南达平泉等地。煤价由一角到一元（开始是小钱、铜子，后来为纸票）。在收入上分“里柜”和“外柜”。从全天总收入提出四成归里柜，五个东家院平分。再提一成做招待费。其余的五成归到外柜，也叫“大柜”，做所有人员开支。据当时的老工人说，里柜每天能分一个宝（白银五十两），大柜分到一百二十石小米（每石九百斤）。采煤方式用手镐刨，用肩扛，井道窄的地方全是爬行。工伤事故不断，劳保福利谈不到。

当地群众租赁赵家矿山开采煤，赵家要抽三项费用：

一、山抽：矿山归赵家独有，谁挖井采煤要交收入十分之二的矿山费。

二、股分抽：山抽以外，赵家算有股分，因而要交十分之二股分抽。

三、水抽：用四个人一齐摇动的辘轳（也叫大橛）来降低水



位才能采煤，赵家出设备，雇用专人，每天不断抽水，保证水位降低，便于采煤。因而要交十分之一水抽。

三项加在一起，赵家要抽去总收入的一半。其余才归租赁人所得。

每年有一个东家当值，全权处理一切事物。由二、三、五三个东家值年，四东家单过不值年。情况是，二、三东家值年时，有事也不做处理，都推到五东家这一值年里解决。所以，轮到五东家值年事情就多得很，加之赵蔚文性情刚烈，疾恶如仇。所以，出现本家赵六子屡劝不改，即派人将其枪杀，从而煤场上局面稳定，没发生过枪劫事件。到伪满四、五年间，日本人从“新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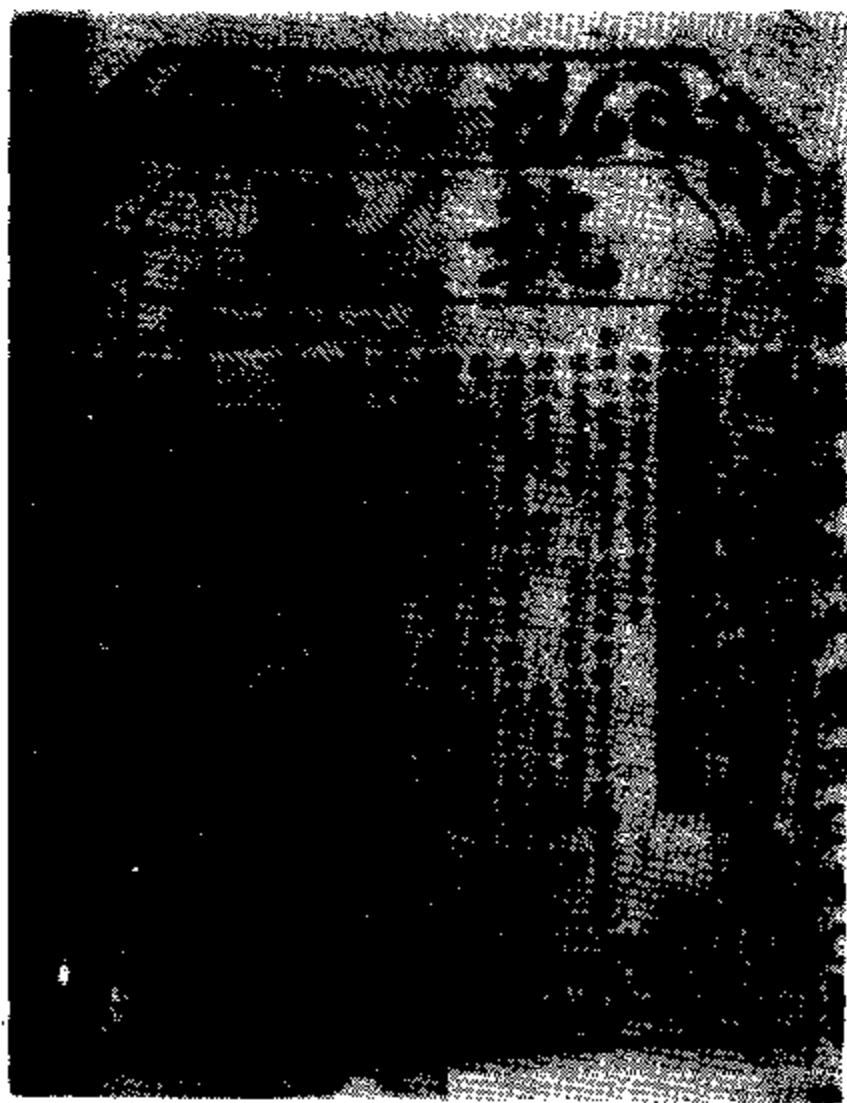
（现长春）派来一名叫大岛川四郎的坐镇煤矿，住在赵家院内称“经理”，实际是暗查赵蔚文的行踪。当时二、四两个东家已死，仅剩三东家一人常值。这时出现了克扣工人，待遇不好，出的煤也不景气了。赵五东家值年曾立下多年规矩，谁的井出煤多，谁拿的钱就多，产量越多，煤井分成越高，有三七、二八之说。老工人不犯大错误，不经过五东家说话，一律不许撤换等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矿山仍归赵家掌管。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后，矿山才归人民政府管理。

归政府后，矿山自由开采，政府收缴三成。另外设一人专抽水，吃一成，其余六成归个人。一九五二年收归国有。隶属热河省喀喇沁旗地方国营生产科、财政科，到一九五九年才归平庄矿务局。接收时，职工四十三人，全矿三百四十一人。

注\* 笔者姜兴东伪满四、五年（1937年左右）这段时间，在赵家教专馆，姜兴东之父又是赵家的文牍人员，因而对赵家的巨细颇知详情。另外，当时赵家主事人已不存在。伪满康德四年，因矿山所有权问题，赵家曾出示“龙票”证明五家煤矿从清

光绪年间就为赵家所有，并委托姜兴东持“龙票”和日本人太岛川四郎赴新京（现长春）重新备案。到新京后，姜兴东住旅店等候，一切手续均由太岛川四郎出面办理，内情姜兴东无从得知。但矿山依然为赵家所有。

注\* 清朝政府发的“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许可证明。是“盖有皇帝印玺的营业票照”。五家煤矿赵家“龙票”已不复存在，我们现转印了朝阳市文史资料《抗暴烽火》登载的北票煤矿的“龙票”，供读者阅读、研究参考。



“龙票”

(“龙票”原文)  
照 执

义字第貳万柒仟叁佰伍拾伍号

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銜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  
 欽命副督统銜兼陆军部侍郎銜都察院副督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  
 发给印照事案准前军督部堂  
 为

奏明丈放锦州府属官庄各地现经督飭委员丈实亩数划清界址据

领户廉万丰系 旗人 遵章纳价承领上则官庄地 捌

亩玖分坐落 州地名 处每年应纳课赋正耗银两

应照奏定章程办理合行发给印照付该领户收执永远为业不准

抗欠课赋如欲将地典卖他人亟应遵照税契章程随时赴地方衙

门报明过户推收毋得隐匿干咎须至执照者

计开

爱字六百六十 号坐落义州府马家沟处

计上则庄地 捌 亩玖分 县

东 南至爱字旁五十九号  
西 北至爱字旁六十一号

每年正课库平银

右给领户廉万丰收执

光緒 元 年 十二月 一 日   给

---

---

## 我所知道的五家煤矿

张宗义口述 张勇整理

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十六岁时就开始在赵家经营的五家煤矿上挖煤。解放以后，五家煤矿划归国家所有，我也就转为国营煤矿工人。

民国年间，五家煤矿周围的五家村、楼子店、三道营子、小五家、望甘池、乔家窝铺、山嘴子等十余个村子都有人在五家煤矿上开窑挖煤。土地改革以前，我们小十大份有七十余户，在矿上干活的就有七、八十人。有的一家父子俩，有的弟兄一齐去。

为了生计，明知是冒着生命危险，也顾不许多。老人们常说：“好过的年节，难过的日子。”有的家三间土房，有的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指着身子过日子，为了生活，为了孩子老婆，不得不去拼命。不然，冬三月好混，开春以后咋活啊！所以，每年秋天给人家打短工的没活干了，有的把自家一、二亩山坡地的庄稼收到家了，托熟人到矿上与赵家管事的联系，偶得这些人的欢心，应允下来，指定地方，就赶紧组织亲朋好友集资筹款，购置木料，准备开窑。一般是七、八户开一窑。每户为一股，每股抽三斗米，作为打井的投资。这也是大“红”没有，大“黑”常常跟着你，因为哪地方煤层薄厚把头都清楚，煤层厚，地势平坦，易挖易卖的地方，一般穷苦人家摊不上，那是赵家亲戚，把头的好友，查山的本家才能得到的。

正常情况下，打成一口井要用二十余天的时间，井的深度一

一般为十五、六丈。见不到煤，或者煤层太薄，或者水大不能采，就算一切报废，连本上仓。见到煤以后，在竖井的底下挖一个能放下装一百斤煤的篓子的深坑，把一个太篓子放在坑内，挖下的煤装在篓子里，用辘轳提升到地面。沿着煤线横着打洞，由于煤层薄，人在洞内只能蹲着或者躺着用镐头刨。用木头做成一个四框中间再安两根横梁的“拖子”，把装着煤的抬筐放在“拖子”上，人爬着把煤拖到井底，倒入篓子里，再提升到地面。人们常说“干的牛马活”，一点都不假，在坑洼不平的井底下，拖上百八十斤煤，用肩硬拉，那滋味是不好受的。肩膀子一两趟就肿了，不干行吗？五天、半个月的熬着，什么时候磨出茧子来，就算行了。什么“干阴间活，吃阳间饭”就更不用提啦！我是提心吊胆的一辈子，不过总算熬了过来。

当时矿上窑井很多，前窑有四十多眼小井，后窑有七十多眼小井，小东窑有三十来眼小井。

一个窑一天出煤一万多斤，一车煤（约三千斤）卖价小米四斗，一个窑一天出的煤卖价值一石六、七斗小米。赵家销售煤有票房子，要先开票再装煤，在开票时，就将小米留下一半，作为窑主赵家的收入，其余的一半才是挖煤的收入。但窑柱木材、筐拖、缆绳、大辘轳等等费用何止又是一半的一半。所剩无几，每人每天最多得到两升小米。查山的还严格检查煤的装载量，发现多装随即进行处罚。

好窑底的地方不让一般人开采，所以大多数的井只能开采一冬天，井下的煤被挖的差不多了，第二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也就停工不干了。多数人又去扛活，当月工，或者侍弄那点山地去了。煤窑的家当也随即变卖，第二年再挖煤时，那就重打锣鼓另开张了。只有好窑底的地方能够连续干下去，有的窑能开四、五年。

挖煤的收入由于层层克扣，每人一天能分到一两升小米就满足了，善良的人们总有一句口头语“挣点就比闲着强”。我们挖煤的最怕出事故，一遇窑塌井陷，伤了人命，便前功尽弃、大祸临头了。要给死者家属“断养殓”费，多则十石小米，少则也要七、八石的数目，各股均抽。多数人非但没挣着钱，却又负下一身债务；少数人倾家荡产后，下后府（指林东、阿鲁科尔沁旗等地）、闯关东（黑龙江一带）的不在少数，历年都有。所以，我们小十大份上百人挖煤，谁也没熬上个好生活。乔家窝铺老魏家民国年间开窑出了人命，把家业都搭进去，卖了土地、房屋，一家人乞讨为生。穷苦的百姓更苦了，发财的只是东家和那些管事的把头、查山的等人。

我在赵家煤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仍是一贫如洗。共产党来了，我们工人才真正翻了身，人身安全有了保障，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

## 解放前公爷府的商业

张文学调查整理

解放前公爷府是赤峰通往热河的必经小镇，又是蒙古贵族府第聚居地。世袭镇国公或辅国公发展到十四代子孙就分为七大支。子孙众多，俗称七大贵族。距二里远的西府，有清康熙第五女和硕端静公主的驸马府。有大型庙宇“灵悦寺”等六处，喇嘛六、七百人。他们豪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都需要大量物品供应。如庙内供佛“海灯”用油一项，一年需千斤。

商业发展，主要是雍正、乾隆年间，蒙地开垦、汉人流入，汉人经商者日益增多。随着社会的发展，锡伯河川上下百里，东沟西岔几十条，住户上万，方圆几百里的物资，土副产品也需要交换。为此清光绪三十二年设立了公爷府二、七集日。在商号、店铺作坊的基础上，商业更加兴盛了。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公爷府已经成为乡间繁华昌盛的小镇，赤峰、宁城、承德和围场的行商也往来于此，经营着贵族、喇嘛享用的高级商品，也沟通着民用品渠道。

民国年间即建有商会。会长是地方上有名望、有实权的头面人物。公爷府“乡约”张麟阁，因他行二，人称“二会长”。继后，“通兴当”二掌柜的左汉卿（外号左老汉）任商会会长，直到解放。商会每年秋天都召开一次各商号代表会议，协调统一粮食牌价。

“通兴当”是公爷府最大的商号，开办于清初，它的财东是山

西榆次县人康秉衡、卢子春、陈立志，到民国年间由姜益斋接手。

“通兴当”内，设有烧锅，杂货铺，当铺。它还经营土地，农村有三处大伙房，每处约有土地十顷以上。三处伙房即：公爷府河南东龙水塘、小府和四十家子的烧锅地。每处都有把头招青经营。东家投种子、畜力，耨青的出人力，秋后四六分成或三七分成。年产千余石粮食（合八十多万斤）。

“通兴当”资本雄厚，联络面广，远近驰名。资金总数以现大洋计算约十万元左右。雇用人员百余号。它的杂货铺主要经营棉布、绸缎、花纱、鞋帽和生活日用品。烧锅是公爷府一带比较大的，每天烧粮一石二斗，产酒五百斤左右。烧粮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自产粮食、收购粮食、以酒换粮。当铺办收当、赎当、兑换当票等事项。

“通兴当”宅院很大，分四部分：一是烧锅院。主体是烧酒的净房以及其他附属房屋几十间；二是伙计住宅院。扛活的、赶车的、牛倌、马倌、伙夫等人的住所；三是伙房院。分大伙房和小伙房，大伙房给伙计做饭，小伙房给东家、掌柜以及来往客人做饭；四是东家住宅院。十分讲究阔气。

“通兴当”有十多辆牛马七套大铁车，盘粮拉货。

“通兴当”有严密的经营管理方法。东家定期到商号听取经营情况，研究决定经营中的重大问题，然后，授权大掌柜办理。大掌柜下设有二柜、三柜、四柜，各掌柜分别掌握一摊工作。商号设账房，有总账房和分账房。学徒为三年出徒，升为店员，店员中好的升为小掌柜的。此外，设有管事的，管理全店事务工作。设有跑外的，采购、盘账。

“通兴当”用人是招聘。学徒要有“保人”，有问题解雇时，把人交给“保人”。掌柜的从商号内提升。学徒的每年十几块大洋，店员发五、六十元不等，掌柜的一百元左右。东家依据



掌柜的能力和商号收入确定虚股（资本没有掌柜的，只是分红利的股分），按股分红利。此外，还有“泰萃豫”烧锅。

民国七年开办的商号“利汇川”和民国末年开办的“德胜长”也是较大的商号。兴盛时期都能日收七、八十元银洋。集日可收入三百元以上（小米一元一斗，九十斤重）。此外还有“德庆恒”、“谦合益”、“大兴当”。

伪满初开业的“同发昌”、“永益兴”、“益兴永”、“永聚兴”等，兴盛历史也不过三、五年。伪康德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对日用品、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度，动辄以“经济犯”治罪，也就是实行公、标、协、自四种价格制度。公：这类物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如粮、麻、鸦片等国家收缴品；标：统一价格标准；协：协商之意，有时可做少量变动；自：售货人自定价，不过是些自产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人们简称为“七·二五”定价，这一定价牵动着商号的命运。上述四个商号，就是这以后时间不长，无货可卖、无利可图而倒闭的。

“永德隆”面铺东家是关里人杨永贵，自己磨面，做挂面。解放后回老家山西。街东头还有姓李的挂面铺和申街的崔家挂面铺。

小型杂货铺前前后后共有十五、六家，赵存俭、张永清、景长庆、景长善、陈福祥、韩寿先、丁永阳、韩寿廷、刘连芝、赵子明、石宝田、姜玉增、景子文、白秀山的杂货铺和张华堂的文具水果店。张思庆原是“谦合益”商号的掌柜，“谦合益”倒闭后，自己开小杂货铺维持生计。李凤阳家中有土地，农忙下地，农闲卖点杂货等。

蒲德茂香铺建于民国年间，伪满后期卖给韩永平经营。

中药铺四家：“大聚源”、“广茂恒”、“德成兴”和“长兴隆”，后期有“杏林春”。

客店五家：王家客店、三义客店、洪记客店、崔家店、胜利

铺。

“天寿轩”是民国时期开办的饭馆。李福、郭荣肉铺。此外有三家季节性羊肉馆，马腾文、葛巴张和杨家羊肉馆。

公爷府烧饼远近驰名。伪满初期从事烧饼业的有十户。王殿元、白福生、马起、李春普、冯长和、张宝泉、史学明、王殿均、张友山和二石把烧饼铺。

各种作坊有丁永刚、徐、彭三家铁匠炉，李广晋、史家两个银匠铺和周、席两家画匠铺。这些作坊虽小，但生意兴隆。王公各家的金银首饰不仅用量大，样式多，而且做工极为讲究，雕刻花卉，烧兰等精工。一个贵族妇女整个头饰好的要上百元，差一点的要五、六十元。因而小小公爷府就有两家银匠铺。

还有刘宝全的理发铺和陈明和的钟表修理铺。总之，五行八坊比较齐全。每逢集日，多数来自三、四十里外的农民下饭馆不可能，为此应运而生的煎饼、豆腐坊不下七、八家。

## 昌盛一时的王爷府商号

木 斯

王爷府府第，也是王爷衙门，始建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一九三三年王爷府衙门前，除了耸立着九棵二百米年的老榆树和衙门大堂前边的粉壁围墙（仿北京宫墙式）外，东西各建有三座门（牌楼式）。围墙的东、西、南三面都是荒地。向南半里处，有用河卵石砌成的十三堆石包（中间大，两翼小），这是喀喇沁王爷每年祭祀敖包、举行盛会的地址。

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邢宜廷代理喀喇沁右旗旗长期间，王爷府当地的官僚、绅士及一些大把主如：陈子善、吴椿令、杨时芳、杨运芳、于兰斋、乌古廷、张麟阁、乌申之等人，积极向贡王之子笃多博的母亲“侧福晋”提议：在衙门前道路两旁建起门面房子，招各地商号来此经商，繁荣王爷府。并建议拆除衙门大堂前的围墙和三座门。得到了“侧福晋”的允许，但她表明大堂前不准盖房，保存围墙南面的“大影壁”，以示王爷衙门的威严。拆除围墙后，拉上铁丝网，网内为“禁地”，决定由王爷衙门“东大仓”（掌握王爷府内部事务的总管处）统一规划地盘，分给上下川的官僚、绅士及当地的大把主，督促他们加紧筹建。这些人领取旨意后，在旺业甸山场、汤土沟林沟等地大量砍伐林木，在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就建起了一座座院落和一处处街宅。一九三四年，上瓦房、公爷府等地商号来此陆续开业。

“利源昌”，房主是代理旗长邢宜廷，股东有总务科长陈子

善、邢宜廷，大掌柜张明远（赤峰人）。股金三千元（满币），这个商店资本雄厚，实力强。在同商号中最为讲究，呢、绒、绸、缎各样布匹及京广杂货俱全，五光十色。最兴盛时期每天收入达一百多元，平时每日四、五十元。

“增发永”栈，房主“东大仓”，股东王爷衙门“侧福晋”，大掌柜顾岐山（大西沟门人），股金一千余元，经营一般商品。商店股东“侧福晋”地位高，势力强大，不同于一般商号。但在经济上投资不多，赚钱的时候股东可以按股分红；赔钱的时候股东不负赔款的责任。

“益发合”栈（上瓦房分此），房主、股东陈子善、杨时芳、乌益寿，股东（顶身股）兼大掌柜王辅卿（河北藁县人），股金二千余元，以经营新式糕点、海菜为主，兼营百货布匹。由于股东的强弱相差悬殊，有权势的大股东在结帐时以检查业务的得失为机同掌柜的进行串通，接受掌柜的礼物，而没权没势的小股东只在分红时取得小利。由于股东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生意的发展。最后为大股东陈子善自己所有。

“德和东”栈（上瓦房分此），房主、股东张麟阁、陈子善，大掌柜姓郭（顶身股，关里人，名字不详），股金八、九百元。资本小，进货不多，经营的商品有布匹、烟、茶、铁货等。股东张麟阁在公爷府人称“二会长”（排行老二，民国年间任过公爷府商会会长），他在“德和东”院内修建了三间住宅（室内木板铺地、浴池），贪图享受。

“利汇川”栈（上瓦房、公爷府分此），房主是乃林李股长（伪旗公署内一名股长、名字不记），掌柜徐锦章（河北乐亭人）。李股长没有入股，只在院内居住。由于是总号出资开设的分号，经营时间不长归回总号。

“天泰糖果局”，房主汪麟阁（哈气沟人，民国年间曾任王

爷府崇正学堂“董事”），经商掌柜张××（锦州人），资本一千余元。他经营的干鲜果品、糖类（如：咖啡糖、奶油糖、蔻蔻糖）闻名王府上下。

此外，还有：“仁术堂药店”，股东桑荣，是王爷衙门“侧福晋”的主治大夫；“博爱药房”，房主陈子善，西医师杨秀峰夫妇（锦州人）开设；“善林阁”印书馆；“锡伯河邮局”等。服务行业有：浴池、善记粮油店（“忠善堂”、“聚善堂”大把主合伙开办）、新新饭庄（伪满军三连连长吴欣甫、希庄乌申之二人合伙开办）、范记照相馆、考家店、架子李烧饼铺、王殿岐理发馆等。

一九三五年以前，王爷府上下川的集市中心在上瓦房（每月逢四排九），上瓦房街四面勾通，西至旺业甸，南至宁城县边界，北至汤土沟及黑龙潭梁，东到王爷府、下瓦房、杀虎营子等地。

一九四一年，伪旗公署迁至平庄，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战争吃紧，日本人实行“配给”制度，日用产品严重缺乏，经济全面枯竭。对棉布、粮油以及轻工产品甚至食盐都采取了“配给”，使得这些商号逐渐萧条，有的不得不改行。如：“利源昌”改行收买皮毛；“善记粮油店”改行修理自行车；“益发合”、“德和东”两处商店门面被“兴农合作社”、“鸦片组合”占用；“增发永”、“仁术堂药店”的房子交给了“协和会”办公。王爷府警察署成立了“讨伐队”、“自卫团”，到处进行扫荡，驻王爷府街上的伪满宪兵队、日本宪兵队，有的人换上便衣到处搜查、敲诈、勒索。在黑暗的政治形势下，昌盛一时的王爷府商号纷纷停业、倒闭、破产了。

---

## 万木逢春喜峥嵘

—旺业甸镇的经济沿革

赵振德

旺业甸，原名“王爷店”，本来是喀喇沁王每当进北京拜谒清朝皇帝时食宿休息的第一站。设有专职管理和奴婢人员。到清朝末期，国是日非，朝覲之事，日渐衰落，王爷进京的次数逐渐减少，一切已是闲置虚设。后来就开始招徕过往行商和车辆。袁世凯窃国以后，贡桑诺尔布以蒙藏院总裁的职位调进北京，进谒之事停止，“王爷店”也就由官设转为民营了。到民国初年不知是哪位有识之士，为了洗刷封建奴役色彩，索性把“王爷店”改为“旺业甸”，取其百业兴旺之义。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

旺业甸的经济发展，是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曲折过程的。听老人们说，这里原来都是属于皇家围猎的场所。开垦这一带地方的最初年代恐怕还是清朝康、乾时期。这里最早的居民多是来自山东各地（尤以鲁南各县为多），他们有的是由山东半岛从水路到辽东半岛，逐渐移徙到朝阳一带然后来到这里，有的由山东从陆地到河北，几经迁移最后到了这个地方。开始时多是因为山东荒旱，地少人多，生活没有着落，逃荒异地，以求生存的贫苦农民。到了这里也是开荒种地以求温饱。当时按清朝法律，不准内地汉人到关外定居，后来禁而不止，只允许春来秋去实行所谓“借地养民”。然而人非候鸟，当时的交通又不发达，一年的辛劳所得怎能都消糜在遥远的旅途中。因此，便冒犯法律偷偷地留

下来。久之，寄留者逐渐定居下来，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法律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了。

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主要的经济。随着人口的繁衍，交通逐渐发达，又有一些河北人（主要是京东八县）来到此地。他们多数以经商或从事小手工业。这就给旺业甸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赤承公路没有修通之前，从赤峰通往承德的大道是走按丹沟川的小美林、黑狐狸洼经小姑盘过梁，或者从南台子走围场再去承德。锡伯河川为茅荆坝所阻塞，交通不便，所以旺业甸的商品流通不畅，人们只能维持最低的供求关系。在民国初年人们为了开通茅荆坝，采取原始的施工方法，选择最短的里程，凿石开路，修成一条极为简陋的通道，其艰险程度不亚于“蜀道”，仅从某些险段的命名即可想见一斑，如“鬼见愁”、“阎王鼻子”、“判官肚子”、“小鬼脸”等等。人们就靠这条路，使用着旧式木轮铁车运输商品进行交换。

尽管鸟道粗通，但毕竟缩短了赤峰——承德的距离。随着茅荆坝的开通，旺业甸的集市贸易和商业、手工业也渐渐兴旺起来。

当时本地山林葱茂，野生资源丰富，除种地外，烧炭、砍柴、打猎、采集山货……都可以作为生活的补充。到民国后期，旺业甸的经济走上了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已经正式立“集”（每逢三、八日），确立了交易场地，从事商业和小手工业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搞运输的人也日益增加，除了座铺之外，还有一些行商和摊贩。每到集日，熙熙攘攘，人流不息。宁城、隆化、围场和本地的买卖行商都汇聚到这里进行交易。从交换的商品看，有土布、棉花、皮毛、绳麻、粮食、肉蛋、牲畜、烟酒糖茶、干鲜果品、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应有尽有。叫买喊卖的，

此起彼伏，十分热闹。这种繁荣景象延续到日本占领东北后伪满成立的初期。尤其在赤承公路修成之后，茅荆坝再不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蜀道”了。旺业甸变成了赤承公路的中心点，商品流通更为便利了，集市贸易的覆盖面更远了。东到宁城的黑里河、八里罕，南至隆化的七家、两家、荒地，西到围场的克勒沟，北至公爷府，成了辐射四面八方的中心点、货物集散的贸易站了。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仅座铺商号就有二十几处，各种手工作坊十余家。其中主要的有：

福增泉，东家是赤峰街有名的财主支栋。在赤峰有烧锅，货源来自赤峰。商号自己有四、五辆大车，每五、六天进一次货，除卖烧酒之外，还经营日用百货。资本雄厚，货物齐全，是旺业甸所有商户中的佼佼者。铺面设在街中心，称得上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德盛恒药店，东家是河北武安人，名叫房效兰，是个女资本家。她的商号遍及好几个省，有钱庄、有绸缎行、有布匹行、有粮行。在热河境内的都是药店。赤峰、克勒沟等地都有德盛恒药店，皆出自她一家。专经营川广药材，她的药店不请坐堂先生，专以卖药为主，有时自己也炮制一些丸散膏丹之类的中成药。这家药店，货真价实，讲究信誉，深得用户信服。在旺业甸掌管生意的掌柜的叫胡新元，也是武安人，很会做生意，他每年回武安一次向东家交帐，平时的业务由赤峰德盛恒指导。

恒兴隆，专门经营日用百货、烟酒糖茶、面粉等商品，东家是宋庆余，河北人，掌柜的刘树芳也是河北人，和宋是同乡。

隆记兴，是杂货店，股东有边兴斋、李宾儒等人，边和李又是连东带掌，外雇几个店员。

林记杂货店，股东是董尚林、陈老炳，陈还是掌柜的，全号也有七、八人，生意也很兴旺。



信元合，经营棉布兼有小百货。东家是彭子安，隆化人。彭自身任掌柜，另雇几名经营铺面的业务人员。

德丰厚，专以副食为主，货物有点心、烟酒、糖茶，此外还有纸张等物。东家是隋相阁，隆化人。掌柜的是高延芬和张森。

站记，是合股商号。股东二人，一个名叫王成，本地人，一个叫纪恩纯，河北人。二人又是连东带掌，以下用几个店员，经营的货物是日用百货。

德顺昌，股东张文奎，原是喀左人，后来定居旺业甸。兄弟二人，大哥张文奎在家经商，二弟张文卿跟大车搞运输，来往于承德、赤峰、平泉等地。家中还有农田几十亩，这是一家亦商亦农的家庭，经营的商品有各种点心、红白糖、纸张、烧酒和水果、花生等，后来又增加布匹和其他杂货。

宝记，东家张文，此人原来是雇农，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家道渐渐富裕起来。张文生二子，长子张宝霖，虽因幼年家贫没有读过书，但为人正直、忠厚，也很会种地和经商。二子张宝珠，以运输为业，原来自己有两台大车，后来被推举为旺业甸一带所有车户的“掌包的”。每当出车时，几十辆大车首尾相接，俨然是一支有组织的车队。宝记经营的商品以酱油、醋为主，兼有其他杂货。酱油醋都是自己酿制，质量很好，胜过外地货。掌柜的叫陈致玺，又是制醋的技师，为人忠厚、诚实，他们东伙之间真可谓管鲍之风。

东升号，东家张鹤龄，回族，原为平泉人。他所经营的是各种糕点，另外，还有羊肉馆、烧饼铺。他家的糕点全是自己制做，味道美，货色好，质量高，货真价实，远近闻名。

除此之外，还有以程兴武为掌柜的瑞兴成杂货店，钱万亿开设的永兴隆货店，以李某为东家的益合斋货店，刘毓丰所经营的福巨斋点心铺，王起发开设的兴发成货店；谭相成的德兴成百货

店。

上述这些都是有名号的，还有一些不立名号的商户和手工业者，如刘锡九的杂货铺，田才的百货店，李宝山的肉铺兼饭店，张茂林的肉铺，赵景阳的烧饼铺，张子修的肉铺，自祥的烧饼铺，房怀德的白铁铺，姜文彬的箩匠铺，赵文奎的铁匠铺，郝德明的成衣铺，郑兴的染坊，李步云的蜡铺，滕永清的铁匠铺，徐长俭的肉食铺，麻绳匠的绳麻皮革铺，张沾的理发店等等不下十余家。

药店除了德盛恒药店之外，还有几家，如：

同义兴，是杨起孝和张日新二人合股经营，坐堂医生是老魏先生，这是比较有名望的中医，尤其对妇女科和产科很有造诣。

宏济堂，东家仇子芳，仇自己也是医生。

奎盛堂，是李云轩开设的专卖中成药材的药店。

上面的几家都是旺业甸街上的，另外还有按丹沟的天成祥，既卖药，又搞磨坊，掌柜的叫刘广德，铺面宽绰，资本雄厚，生意十分兴旺。在福合元还有汇春堂药店，东家是刘庆云，刘本人也是远近知名的医生，以治疗小儿科和外科著称。

当时旺业甸还有几家旅店，其中出名的有两家：一家是长发店，一家是郭家店，每天接待大车几十辆，旅客数十人。店里服务热情、周到，伙食也实惠。

从民国时期到一九三六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旺业甸地区的经济由于多种因素，得到了暂时的发展机会，出现了第一次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寇的侵略和压迫日甚一日，敌占区的各项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旺业甸这个较为富庶的角落，也和其他敌占区一样，在侵略者的践踏蹂躏之下，生产萧条，经济凋敝，开始走上衰落的道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商号和店

铺纷纷倒闭。仅仅五、六年的时间，药店只剩一家德盛恒，作坊只剩房怀德的白铁，滕、赵两家的铁匠炉和张洁的理发店。

---

## 李贵和“大德源”

于成龙

解放前，在老哈河川方圆百里，提起“大德源”，妇孺皆晓。“大德源”是烧锅字号，它所在的三家村，也因此被称为“大德源三家”。解放后简称大三家，属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过去当地人一提“大德源”，总是和一个被称为“李大老爷”的人物相提并论的。直到现在，大三家村的一些老年人闲暇无事，坐在一起，也经常谈论这位“李大老爷”的一些趣闻轶事。

所谓“李大老爷”是满清时代的一个官僚叫李贵的，祖籍河北省迁西县台营镇马五营人。大约生于一八五〇年以后（咸丰年间）。从他在当地的一些作为推断，可能也是一个平民。因他母亲是光绪皇帝的乳母，他就靠这种关系发了迹，册封四品皇堂。还有什么“见官大三级”等一些说法。不管咋说，很受到清室的优待。但因为他目不识丁，大概光绪看他做不了什么大事，也就没授他实权，只是个虚职。这样的官职，在京师本不是什么出奇的。大概这位老爷在北京待得太腻的原故，想到北方闯荡一番，凭借自己的势力发展一些事业，于是来到了口外。在清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左右，其时李贵三十多岁。先在宁城县石桥子石举人家落脚，以后又到了老哈河川。

这样一位皇室亲近人物来到当时地广人稀的塞北荒原，当然就是“土皇帝”。那些御赐的宫灯纱罩、官服、顶子和黄马褂，足以证明这位大老爷的身价。靠官府奉献和搜刮兼并，逐渐发展

了他的经济实力。据说他在口外有几十顷地，四个烧锅：大德源、大德泉、大德永、大德昌。“大德永”和“大德昌”在宁城；“大德泉”在现在的元宝山区平庄镇太平地村（当时叫烧锅地）。这些烧锅土地都有其不同来由。如“大德泉”这个烧锅就是替吃了官司的鲍家走动官府而后到手的。

大三家村的制酒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人们记忆，早在李贵之前道光年间，是由一家姓郭的开设的，字号为“六合增”，后又转手他人，改字号“天成金”，归李贵后，才改为“大德源”，和太平地的“大德泉”并称上、下柜。

李贵时代的“大德源”拥有土地一千五百多亩，招有二十几家佃户。大三家的李民和郭有才的先人都为李贵帮过青，称为李家把和郭家把。光绪中期是“大德源”制酒事业的鼎盛时期。地址在大三家村中部。据土改干部现已退休的剡山林同志回忆，当时“大德源”酒房、住宅和场院等占地三十多亩，房屋五十多间。正中门楼上高悬一块黑地烫金匾， “大德源”三个大字龙飞凤舞，气势非凡。

酒坊日烧高粱一石二斗（折五百公斤），如加班，就日增加一倍，日产白酒四百五十斤。这在当时也就很了不起了。酒坊雇用技师（酒大公）三人，杂工十人，此外，还有大掌柜、帐房、外柜等数人。李贵作为东家，并不常到酒坊来，一切交掌柜执掌，坐享其利。

传统的白酒酿造方法比较简单，设备也不复杂，只有七个六尺多深的糟池和木桶、甑锅、缸、瓮等。工艺流程大体是：先把高粱磨碎，加水蒸熟，再拌上谷糠和曲子（曲子是用荞麦、豆类、杂粮等特制的）调匀装池，踩实发酵，七天为一圆池，然后取出装桶蒸，上面在一定距离处置锡锅一个，内装凉水，水蒸汽上升到锡锅底，冷却后沿一管道流出来，就是白酒了。一天装一

个池子，七天为一轮，这样循环不断，每日都出酒。那时也没有试度仪器，只凭“酒花”测度，就是把酒斟到一个特制的大杯（看花杯）中，以波花定度。“大德源”白酒嗅之甘美芬芳，饮之浓烈醇厚，回味绵长，在方圆百里是负有盛名的。但由于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平时除官府和地主豪绅等富裕、殷实之家享用外，一般穷苦百姓平常饮酒者为数极少。就是红白喜事，小户人家也很少用酒待客，因为一斤酒就是几口之家的数日之粮。白酒销量最多的是年节之时，本地和外地换酒之人络绎不绝。当时大部分是以粮换酒，每百斤高粱换酒五至七斤，其利润是很高的。

李贵的土地年产粮二十多万斤，与耨青户对半分成，再减去人畜消费，用于烧酒的粮食不足十万斤，而他一年中要用二、三十万斤粮食，不足部分，就和附近大户去借。名曰借，其实是硬要。当地一些老年人讲起来，常常用河北腔调风趣地学着当年李贵的话：“老爷烧酒没粮了，向你借点。”还没等主人回答，就接着说：“不吱声？不吱声就是同意了，装粮食吧。”至今在大三家留下了“不吱声就是同意啦”一句风趣话。此种方式是烧酒用粮的主要来源。当地很多地主都被他“借”过粮食，没有人敢不给，有的换回点酒，有的弄点酒糟，大部分都不敢去要，自认倒霉了。但据说他从未向小户人家这样“借”过，也许，在他眼里，不值得一“借”吧。

李贵为了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除雇有贴身护卫和炮手外，还养了一队兵，拥有几十条枪。兵营就设在大三家村东北临近老哈河的小土山（半拉山）上，筑起了土围子，四方修筑炮台。每天吹号巡逻，很有声势，主要是防范隔岸建平县的土匪，使河东的几股土匪不敢轻举妄动，客观上起了保护地方安全的作用。据说李贵在毛家窝铺等地也抓住过几个土匪，一律斩首示众。

对于地方上一些豪强，也进行一些抑制和打击。他手下一个姓石的管家，因为仗势欺人，搜刮民财，就被他革职抄了家。他自己出入也很谨慎，一般是让他的随从乘坐他的车或轿，而他则扮成随从骑马夹杂在护从中。

当时这里属承德府平泉州建平县，民国时改为宁城县。府官也让他几分，州县官更不敢触犯他。有因事犯法或被控告的平民，投到其门下，叩头求救，他就留下干活，保护了起来。州县衙门的差役来传人，必须先到李府禀告，他先是客气地让差役“休息几天”。几天后又说：“你闲待着也没意思，给老爷干点活吧！”一干就是几天，把差役累得要死，再三求告，他才给两吊钱路费，打发回去，并说：“告诉你们官儿，一点小事，老爷处理了，不要再来了。”这种恶作剧的作法，据说也保护了一些含冤负屈的百姓，但有时也难免庇护了某些为非作歹之徒。人们是善良的，总是记住并传颂好的一面。

李贵来往于河北、平泉和本地之间，前后约二十几年。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他五十多岁时回老家，不久病死。这位光绪皇帝的干兄弟，除了被人们称为“专治豪强、不害百姓”外，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一生未娶妻室，也从不近女色，所以也从未有什么抢男霸女之事，而且也没受过宫刑。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官僚，也算为一个“怪”人了。

李贵死后，其侄李建侯（绰号李球子）来大三家继承其叔父遗产，继续开烧锅。并由河北老家请来李玉华、于文博等亲友为其掌管家业，在当地聘用了程子良、韩德茂、陈阳、赵×等人，企图重兴叔父旧业。但这时已是民国，李家失去了在清王朝时的权势，再象其叔那样“借”粮是没人买他的帐了，加之官府勒索、土匪敲诈，酒坊事业日渐零落，曾遐迩闻名的“大德源”再也撑不起原来的气势了。李球子也在一九三六年死去，就丘（浮

厝)在“大德源”的一个角落，直到解放后才移葬。其子李鼎新在父死后来大三家。此人在河北老家大概了解一些抗日战争的革命形势，所以唯以变卖家产和土地为己任。几年间，所剩无几。一九四六年，全家迁回河北。“大德源”的历史也就彻底告终了。



---

# 永义合药店

张云岫

“德兴永”，人称老药局子。建于光绪九年（1883年），股东是宁城北山嘴老杨家。原址，老哈河东建平县的柴达木村，光绪十三年迁至山嘴子后街，占用中医张福春的房子，张家就做为房股。没设坐堂先生，张福春虽系中医，但不以行医为业。

“德兴永”大掌柜姓徐，平泉人，雇用十几个伙计，批发、零售方剂。经营七十多年，到民国三十二年趋于没落，“永义合”老掌柜苟景祥就是在“德兴永”药店出徒。

## “永义合”的建立

苟景祥为人忠厚、老实、可靠，但很愚笨，能力低，因而常受大掌柜徐的训斥、责难。所以，出徒后就辞退不干了。平泉“存仁堂”药店的总经理尹忠义是苟景祥亲娘舅，尹忠义又和高粱秆子店地主潘家相好。经商议，尹忠义出一个钱股，潘凤翥家出两个钱股，苟景祥为大掌柜，算人股，共四个股份的买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距山嘴子仅二华里的高粱秆子店潘家开设了“永义合”药店。聘请的另一个掌柜是宁城县瓦房人田宗尧，田宗尧系宁城小城子“永安堂”出徒，田为人也极忠厚。他的父亲在“永安堂”药店赶大车，因车祸被轧死了，除“永安堂”孟家给厚葬外，田宗尧没提任何要求。田宗尧出徒后，辞掉

的话说不出口，又不想继续任用，就采取了一连三年不给增加工资的手段（旧社会学徒，每新的一年都要增加一点工钱）对待他，田宗尧本人也就理解了“永安堂”的用意。恰在此时，“永义合”药店建立，一切事故由孟家承保，把田宗尧举荐给高粱杆子店“永义合”。“永义合”又雇用七、八个“劳金”，就开业了。大掌柜苟景祥，二掌柜田宗尧。

## 买卖家的规矩

高永安，字城县瓦房人，现在宁城瓦房当中医；孙茂令，现在甸子医院。他们是同年，民国十六年到“永义合”学徒。学徒要有“铺保”，就是说，要到“永义合”学徒，必须有另外一个大买卖家或者有钱有势人家举荐、担保，对被举荐人的偷、摸、渗漏一切承保，用人店铺才能录用，还需立字为证。高永安的铺保是宁城小城子“永安堂”；孙茂令的铺保是“保安堂”。店铺有铺规：三年学徒时间内不准回家。这对十二、三岁的小孩来说是够苦的了。

学徒在店铺内没有坐位，一天内不准坐，不管是卖药时间，还是来人客去，以及在其他掌柜面前，都必需垂手而立（似今天立正姿式）。还要及时给大掌柜装烟、点火、倒茶水、叠床褥被、端尿盆、打扫店铺卫生等，所有杂活都必须干。

按合同说学徒工三年不给报酬。但一年中如果买卖顺利，利润好，年末也给十来块银洋，折合小米一千来斤。第二年给十二、三元，第三年给十六、七元等等。

相对说，当时买卖人生活好，是说比农民好的多，没有缺吃、少穿的威胁。在吃上也有规矩，只要是吃的东西，不分掌柜还是学徒都可吃足，比如，应时的吃食物，夏季来卖西瓜的，从

公款中拿出点钱买来，大家吃一顿，大掌柜，股东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就是一分钱，中饱私囊那是绝不允许的，是最丢脸的事。

人笨，卖错了药价，或者某件事应酬的不好，都可原谅，甚至发生大掌柜要辞退的情况，铺保，别人都可以说情，“锯锅”，只要认错，还可以继续再干。唯独偷摸的事，最可耻，最见不得人，非但店主不谅解，承保人都觉得跟着丢人。所以，当时买卖家有句流行的话：“王八、兔子都可用，就是不能用贼。”

三年出徒后叫“劳金”，工价多一些了。在一个店铺连续干上一、二十年，又可给几厘买卖，比如，“永义合”原四股买卖，又用上两劳金，每个给二厘买卖，这个药店再分红时就按四点四股分红了，这只限于分红。三年分一次红利。买卖兴盛，利润好，除正常工钱以外，每人都能给点辛苦钱。

“永义合”药店招贤用人的规章是很严格的，除上面说的一些规章外，还有一些规矩：“三爷”不能进店。少爷、姑爷、舅爷不能当掌柜、劳金或学徒，免去特权产生的不良影响和作用。

药铺学徒是不打骂的。每天晚间，大掌柜都要把一天的情况说一下，小掌柜、学徒受训斥是常事。“劳金”不挨训了，但是，在训斥学徒时，都必须一同听着。

还有一条规矩：东辞伙，一笔抹；伙辞东，一笔清。股东要辞退某一伙计，不论他拖欠柜上多少钱物，都不能再要了。如果是伙计自己提出不干，必须一次偿还清再走。

以上可以看出，学一个像样买卖人，也着实是不容易的。

## 服务上的要求

服务态度是针对全店铺人员的，它不分掌柜还是学徒，不但

药铺当时是这样，其它一切商铺都是如此。概括起来，叫做“三声”。

来有迎声：顾客一进门，都必须有话。最常用的话如“您老才来？”“您老买点啥？”“里边喝茶”等等，使顾客感到亲近、温暖，从思想上产生好感。

问有答声：顾客问话必需恰如其分的及时地回答。在回答中，要介绍商品质量、产地、性能、使用方法等等，使顾客对要买物品有基本或全面了解，达到把商品卖出的目的。这一声相当重要，如果店铺内有货，经你答对之后，顾主没买去，就被人视为无能，是买卖人的失败。

走有送声：“您老走好”、“您老慢些走”、“您再来”等等。总之一句话，顾客进店后，把你应酬得不买一点点东西就走，在感情上觉得不好意思。

## 经营方式

铺店以“信誉”为宗旨。在店铺显眼处都贴着“货真价实”、“言无二价”、“童叟不欺”、“信誉第一”的条幅。是以信为本，多卖货、多收入，争得更多利润为目的。所以待顾客为“贵宾”、“财神爷”，笑脸相迎，泡茶倒水，帮助顾客看管车辆等等，使顾客感到处处方便。

在货物上决不以次充好，药的等级决不混同。中药肉桂，有紫油桂、连桂、包头桂、桔儿桐；厚朴有：紫油厚朴、单如意、双如意；当归有：归头（活血之药）、归身（养血之药）、归尾（破血之药）等决不混充。一定要按方付药，讲究信誉，对病人负责。

“永义合”药店批发、零售兼营。药价以祁州（现在河北安国县）或者营口为准，零售大约一至三的价格数目。店内没有坐

堂先生。周围百里的中医都来此批发，药店得利润百分之五十。当时医生卖药，或者药店卖都不说每一味药多少钱，而是总数，一付多少钱。批发、零售都可赊欠。秋后打完场一笔清算，但是另加利润百分之二一三十。在秋后还帐时，粮、烟、柴、草都得要，抹零去稍的有；瞎了，要不上来的有；该户实在困难，没法要的也有。另加百分之二十一三十利润，就含有以肥补瘦的意思。

在经营店铺中，最讲究“后成”。就是雄厚的资本。使用家具，大的房屋、车辆，小的药橱、箱柜、桌椅器具制买时需花几百块银元，但反映在店铺账面上，“永义合”只打“五元”钱。股东不能再分红，这就叫“后成”。

### 中草药采购和中成药制做

清光绪年间，方圆百十里，散医上百人都是高粱秆子店“永义合”的主顾。长期靠“永义合”批发药的散医就有五、六十位。销售额上万元，每年纯利润可得五、六千银元。零售方剂所得的利润也不下此数。

当时主要进药点是河北祁州（今安国县）、天津两地。要进药打成包，每包一百七十至二百斤左右，由货栈负责用骡驮运，分成三站到：第一站运到沧州，二站出口到平泉；从平泉再找大车拉到店铺。办好托运手续，托运人就不必再过问了。

本地也能采购到二、三十种药物。如甘草、防风、地骨皮、黄芩、远志等。数量大也可外运，平泉药店就长期使用这一带的甘草。

十三、四个伙计的药店，还兼制中成药。切、割、炒、制都是自己动手。能制上百种丸、散、膏、丹，水丸、蜜丸、挂糖皮均可。伴随季节的变化，流行病的传播，增加“时令药”，如“一

元散”、“碧玉散”、“香连丸”、“白术散”、“珍珠散”等。加工的成药，利润大大增加，又方便群众。夏秋之际，大人、小孩泻肚不止，花不多少钱买两包“白术散”吃上即好。

中成药用料上，颇为讲究。药质纯正，份量准确，做工精细。如“六味地黄丸”味数不够不配制，决不相互顶替，做到信誉第一。

药店去祁州、天津进药可以赊帐，再往外批发也赊销。当时天津“隆顺裕”、“聚兴合”都是名盛药店。“永义合”与平泉“存仁堂”、凌源“天生堂”、八里罕“三义合”、宁城小城子的“永安堂”都有来往，互相调剂品种。数量少，不必去人，写上一封信，即可运来。药的种类很少有缺的情况。

随着民国三十二年山嘴子“德兴永”药店的关闭，高粱杆子店“永义合”药店兴盛一时。对以高粱杆子店为中心，一二百里内行医治病，驱魔健身起了很大的作用。

“永义合”药店一九四七年土改时收归国有，纠偏时又返回股东。于一九五二年关闭了。

## 杏林春药店

朱家骥

“杏林春”药店位于公爷府本街。民国八年（1919年），由周秀峰主管经营。

杏林春字号，是根据孙思邈的传说而起的。传说皇姑患疑难病症，太医都束手无策。皇帝张贴皇榜招募天下名医。医术精湛的孙思邈毅然揭榜，治愈皇姑。龙颜大悦，随封孙思邈为“药王”。

孙思邈房前屋后种有大片杏林。有一次，孙思邈行走林中遇一斑斲猛虎，张着血盆大口发出悲哀之声，孙思邈被惊呆吓瘫。惊魂即定后再看，猛虎只是哀吼，未有伤人之意。孙思邈很惊讶，仔细看虎嘴里流着鲜血，一枚银簪扎在虎口里。孙思邈将药钵支在虎口，随着将银簪取下。虎不但没吃孙思邈，后来经常守在孙思邈那片杏林中看护杏林。无人敢偷摘杏吃。这个传说就是“杏林春”药店字号的由来。

周秀峰（生年不详），河北省武安县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因生活所迫，他辞别妻子和两个孩子，只身远离故乡，到公爷府落脚。自幼好学的周秀峰不但很快学会了经营药品的技能，而且学会了诊脉治病。一九一九年在公爷府成立了“杏林春”药店，自己担任经理，并且坐堂看病。他擅长妇科，开业后生意很好。一九三八年生意兴隆时期，资金（伪满币）达三万余元。他手下有两名副经理：李培华、梁存业。店内成员达十余

人，各有分工，有的办外交，有的切药，有的制丸散膏丹等成药，还有帐房先生。

一九四二年，由胡广荣领东，周秀峰出资本现款一万余元，在赤峰三道街成立了“同春药店”。“同春药店”的名字是随“杏林春”的春字而起的。有经理三名：胡广荣、王文玉、李杰三，店内从业人员十人。我当时十二岁，在本店铺学徒。本店批发零售兼营。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当时，林东、林西、大板、宁城、围场等地区都从“同春药店”进药。

周秀峰先生在有生之年为中医中药事业做出不少贡献，培养了一批人材。现在，赤峰中医院的中医大夫梁天柱、王汉林，都是周秀峰老先生在“杏林春”药店培养出来的。

周秀峰老先生于解放前因病去世。梁存业继任了“杏林春”药店经理。一九四六年梁回原籍河北武安县，由周秀峰的儿子周文科经营。因周文科不愿搞医药行业，最后店内只剩二、三人。于一九五一年关闭。



## 解放前喀喇沁旗邮政

王殿章 王文杰整理

喀喇沁旗早在清光绪年间，贡桑诺尔布任扎萨克时期就已开办邮政。最初由驿马站通信，驿马站撤销后，贡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开办邮政事业，据现有资料考证，此乃我旗邮政之始。

据《内蒙古纪要》（人文地理）记载：邮务始于光绪二年至二十二年（1876—1896年），在京设立总局，总管邮务。至于蒙古地方，地广人稀，通信不繁。仅限于开拓地方设有邮务局而已。今举其所在地点如次，属于北京总局所管有：古北口、承德府、滦平县、宣化、张家口、赤峰、喀喇沁王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贡王痛感本旗邮电不通，诸多不便。遂派人到离王府九十华里的围场县接洽，取得县方同意后，采伐附近各山的松树，自围场的克勒沟到喀喇沁王爷府，在长达九十华里的范围内，贡王亲自督工，架设电杆，使王爷府与国内各地的电话电报畅通，不复使人有边塞荒漠内外隔绝之叹。他又由旗内选出精壮蒙人三名，分为三班，徒步往返于北京、喀喇沁之间，递送邮件。并设邮政代办所及电报处理等机构，派员专司其事。当时的主要邮路有：第一条由王爷府至承德；第二条由王爷府至赤峰；第三条由王爷府至围场。邮差和邮费均由旗内支付。

自邮电畅通以后，崇正学堂、毓正女学堂等各校师生及旗民

中的知识分子，大批订阅北京出版的报章书刊，当地人民大量吸收到外界文化，文风蔚然，盛极一时。贡王创办最早的报纸《婴报》就是通过王爷府邮政代办所发行到各地。

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当时在喀喇沁境内的邮寄代办所有：西桥、按丹沟、美林沟、喀喇沁、公爷府、上瓦房（撤销时间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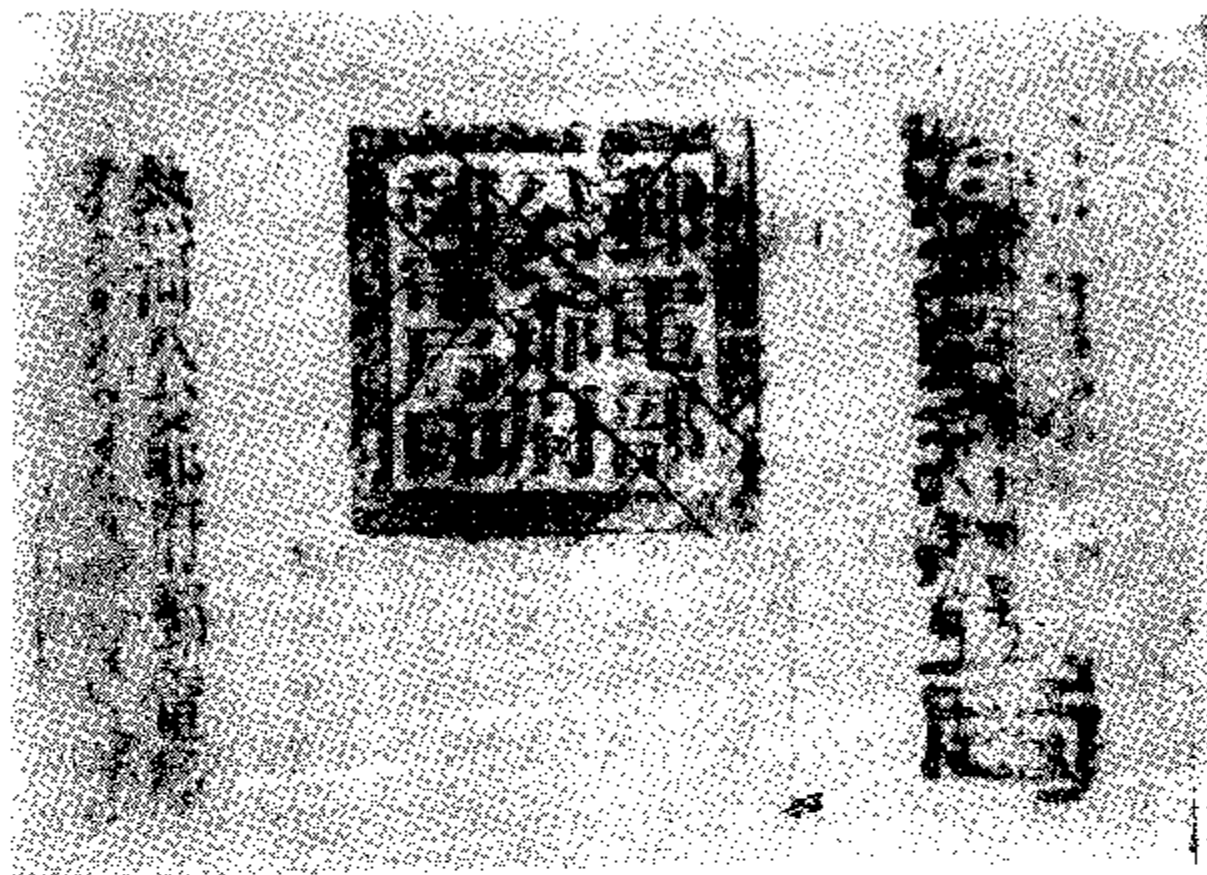
伪满时期的公爷府（现锦山）有邮寄代办所一处，由私营“东升店”代办，来往信件都由姓尹的店员投递。

一九三九年，王爷府建锡伯河邮政局，局长陈万清（摘自辽宁省档案馆《满洲国官吏录》），投递员杨松桥。

日伪统治时期，在伪旗公署所在地平庄增设邮政局，各村（伪行政村）设邮政所，主要是为各地“警察署”或“分驻所”、“村公所”服务，为他们传递文件报刊等。老百姓邮寄信件一是邮价昂贵，二是投递缓慢，有时受到限制，不能保证通信自由。至于电话则是统治机构的专用工具，一般人根本不能使用。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到一九四八年末，喀喇沁旗没有组建邮电机构。一九四八年春，在公爷府建立热中军邮办事处，当时只有围场至克勒沟、小牛群经王爷府至八里罕军邮路线一条，由军邮员负责邮件、报刊的传递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建立了建西邮电局，配备了人员，开始办理各种邮政和电报、电话业务。同年十二月建西邮电局改为公爷府邮电局。热河邮电管理局派李鸿昌同志来公爷府邮电局做报务工作，是喀喇沁旗邮电局建局后的第一位报务员。全局有职工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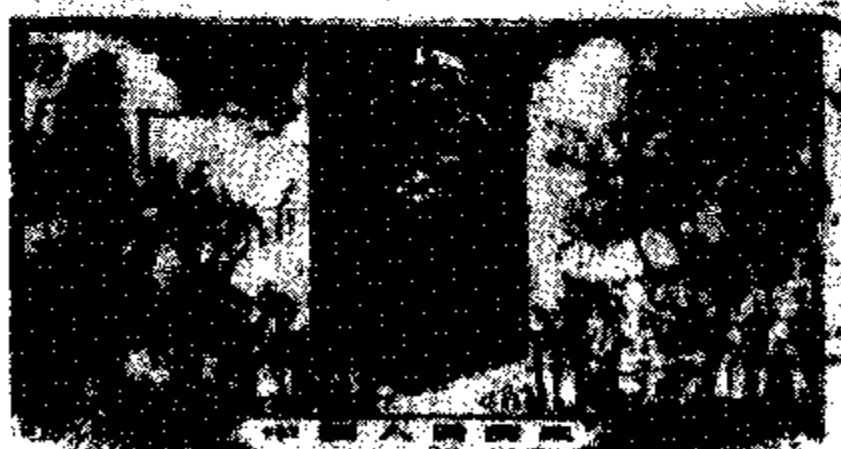


解放前后喀喇沁旗邮电局邮戳

左：热河公谷府邮电局（1949年）中：邮电部公谷府邮电局（1953年）右：建西邮电局（1949年） 王殿章提供



清代邮票（壹分）



现代纪念邮票(800圆) 李景荣提供

---

## 山嘴子焰花爆竹

张云岫

爆竹，从两千多年前汉代用火燃竹，以取燃爆之声，驱魅祛鬼，到我国四大发明，对硝、磺、炭混合会引起爆炸反映，火药便问世了。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诗句中，描绘出爆竹问世，给欢度喜庆佳节的劳动人民更增加了欢乐气氛。当时，焰花仅是豪商富族争雄斗奢的游戏，明、清进而成为封建贵族的消遣品了。发展到今天，人们过春节要放鞭炮，以示送旧迎新，预祝一年的顺利；正月十五上元佳节，要燃放各种花炮，以助余兴；国家每逢庆典，也要燃放鞭炮，庆祝胜利；商铺开张放鞭炮，预祝财源茂盛；结婚更要放鞭炮，预祝喜寿绵长，比翼双飞。总之，鞭炮、焰花都和喜庆相连，因而普遍受到人民的喜爱。农村每逢过年有“女儿要花，小子要炮”的说法。两千年前驱魅祛鬼迷信用途的鞭炮，已成为人们喜庆大典等各种场合不可缺少的娱乐品了。

山嘴子村袁宗永弟兄三人会做精制的柳编活，水斗、簸箕之类。朝阳刘振邦做一手好爆竹。双方议定，秋后打完场，刘振邦来山嘴子教鞭炮的制作方法；开春以后，袁家人到朝阳教刘家柳编手艺。各得其所，互相学到精巧的手艺。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袁家弟兄三人，加上两三个子侄，在刘振邦指导下，开始做爆竹。这一年做货不多，据说只有一大盆药，却挣了不少钱。第三年雇来朱茂林。到一九三五

年，发展成为六股的买卖。除自己家人外，又雇了六十多人的“劳金”，分成两个车间，擗筒子的，制鞭的。这一年盈利五十石小米。

## 各式花炮

经过几年的精心研制，袁家鞭炮在周围百里有了很高的名气。“双响”讲究下半截打筒，上半截打的高，响声尖脆，明亮，炸得粉碎。不仅做一般的鞭，而且会做响中有花，花中带响的“文武鞭”。晚间燃放，十分壮观。除鞭炮外，能做十几种花炮：高耸入云的“起花”，红花中显现出绿叶的“泥花”，小孩喜爱的“手花”，还有“炮打三星”、“炮打五星”、“炮打七星”、“炮打五龙”、“三仙出洞”、“金银碟”、“灯花炮”、“炮打灯”、“冰盘落月”等等。

这些花炮的制作，都是每年干一冬鞭炮活收作的时候，用剩下的药底子赶做出来的。

为了招徕更多更好的生意，创名牌子，一九三五年冬，从朝阳桦树沟请来更高明师傅，制作“焰火”。有：

盒子。整个呈圆型，直径约两米多，高十二层。每层制作一出戏，都用药捻连好，把人卧倒在里面，用纸隔开，共十二层。小戏有“八仙过海”、“白娘子遇许仙”、“三英战吕布”、“梁山伯与祝英台”、“美猴王撒尿五指山”、“四个小白兔”、“四人看牌”等等。每层中人与人之间有捻连着，层与层之间也有捻连着，捻的长短按时间需要安放。开始底层先燃着，药捻连着，灯光明亮，呈现出整个人影和剧情。停留一段时间，上层又被燃着，又呈现出另一出戏。依次出现，十分精彩，引人入胜。不用人工临时整制，可连续放完。

斗子，也称四门斗。在大约五十米远的四个角上，竖立四个“斗子”呈方型，当中放一筒泥花，四角放上手花，炮打灯向上，还挂有五百头的大鞭。四个边角都有药捻连接。连接的捻子都涂有“超挠”（一种硝酸钾、镁粉等易燃品），风天也刮不灭。点燃之后，四个角的手花一齐对射，泥花、炮打灯的花、灯一齐向上，五彩缤纷，灯花齐放，十分美丽可观。

铁树开花（猴钻天）。用树枝子一棵，顶端捆好一个纸做的小猴，腰部捆好一个手花，把若干“三仙出洞”之类的花炮分别捆在树枝上，连上捻子。点燃后，花、灯齐放，整个树身照得通明。这时，小猴腰间的手花向下射出，象撒尿一样，颇有情趣。然后小猴腾空而起，冲上九霄，煞是好看。

葡萄架。用细铁丝将许许多多小棉球一串串地捆在葡萄藤一样的树条上，每个小棉球都蘸上硫磺，晒干后，再喷上一种易燃的药品，沾着火，立刻全部燃着，显示出一串串蓝绿色的葡萄，象真的一般。

其它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做工极为精细，捻的长度，着的快慢都必须适应每个节目的需要，不经过多次实验不会成功。每一出小戏，每个细节都体现出匠人的高超技艺、独特的风格。相隔三年，袁家放过两次，每次都要五百元银洋的成本。

## 爆竹手艺的沿续

当时，山嘴子鞭炮远近几百里很有名气，时至今日，都认定鞭炮是山嘴子的特产，事实也确如此。那时鞭炮销地，东至朝阳，西到围场，南达承德，北到林西、林东。一到冬季，车拉驴驮，换到的多数是小米、盐之类。

现在山嘴子村，每年秋去冬来，另是一番繁忙景象。男女老少，都能通手，都有活干。各家各户，起早贪黑，捋纸、裁纸、

刷壳、擀筒、砸隔子、打捻、安捻等十几道工序才成一个个双响。辫鞭更费事些。当然这一冬的劳动报酬也是可观的，平均每人增加五十元收入是不成问题的。

每年春节临近，汽车、拖拉机、小驴车几乎每天都有，他们车拉船载运往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西部，获取更高的利润。卖时，都说明这是真正的名牌货：山嘴子烟花爆竹。

## 公爷府最早的李家油坊

解 生

光绪三年(1877年)，公爷府第一家利用木槽打油的是河南中村李久春家。李久春，人称“大油匠”。他和他的父亲李福靠着这笨拙的制油技术为当地的地主、商号、寺庙、王公等打油，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油房里度过的。

木槽式打油所用工具：大油槽、木楔、铁箍、铁锤、麻线包等。“大油槽”是打油所用工具的主体，长八尺，宽二尺，油槽两个帮的选料很讲究，一般是八寸多粗的大榆木，两头各用两根直径为五寸、长四尺的榆木做撑子，撑子的两头各有别头簪，以防砸木楔时把木槽撑坏。木槽底也是用比较好的榆木料，在二寸厚的榆木板中间通长上下掏一个一指宽、深的小槽，而后把木板放在槽底下固定住，油槽就制成了；“木楔”用料更讲究，当时是用色木或山黄榆，这两种木料，木质坚硬、有韧性。木楔有大中小三对，长一尺二寸。小的厚二寸，中号的厚四寸，大号的厚六寸。每个木楔上头都用铁箍箍着，以防砸破头。平时也不是只准备三对木楔，还要有备用的，以备临时换用；“铁箍”是用来箍包用的，一般有十八个铁箍，每个大小一样，直径一尺八寸，宽二寸，厚半寸；“铁锤”有三等，大号锤八十五斤，二号锤七十五斤，三号锤三十五斤；“麻线包”是装料用的，全是李家自己编织，麻线包用料也很讲究，大都用青麻，青麻淋油快，不粘油。线包的编织密度与我们现在用的麻袋差不多。



打油过程：将小麻籽（俗称线麻籽）用碾子压碎，上锅蒸八分熟，而后装包。把麻线包对折几褶围成一个上口直径八寸、下口直径四寸的筒，将下口用棕绳封上，即可装料。一边装一边用脚踩实。一般一个包装头茬料二十五斤左右。装好包用铁箍箍紧，把箍紧的包一个一个地摞起来（立式），摞起包的高度和木槽长度差不多。再用绳子将摞起的包捆紧打成老垛，放在木槽里。事先将油槽一头垫起一定的高度，使整个槽体上下有一个小坡度。然后在木槽的上头紧挨油包的地方下第一道梁子，梁子是用坚硬的木板制成的，长和木槽的宽相等，高一尺，木板厚度不一样，三道梁子越是后上的越要厚些。每个梁子上都有两个码口，木楔就是顺梁子的码口砸下去的。每下一道梁子都要砸下一对木楔，先下小木楔，小木楔刚砸下去时，油就从槽底的小槽中流出来了；下第二道梁子，砸下第二对木楔时，油流得正旺；但是要把油出尽，还必须用上第三道梁子，砸下第三对木楔。砸第三对木楔需要老师傅下场抡头号锤，至多四五下即可。当时的打油看起来很笨拙，但也有较高的技术，砸油楔就是关键的一环，必须是两个油楔一齐下，否则会把油包挤偏，严重时会把油包或木楔崩出来，造成人身伤亡。因此砸木楔不光是有力气就行，很大程度上是手劲，不然一锤下去难保不会出问题。每槽用料三百五十斤左右，每百斤料出油二十五斤。一天装槽两次，每天午前上新料，午后装头一天的二茬料（出过一遍油的料）。这样一天能出油一百斤左右。

李家加工的油由几家大商号经营。至于油的销路，老百姓很少用，大量的油都被寺庙的喇嘛、和尚和王公们用了。听老年人说，解放前公爷府上下一带光寺庙就有三十多个，这些寺庙都有各自的庙会日子，再加上年节供佛念经，点长命灯，所以用油量很大，据说光公爷府“灵悦寺”一年用油就达几千斤。

## 高粱秆子店“画棚子”由来

王守智

我国木版年画最著名的要数天津“杨柳青”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明末清初，是我国北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绘画艺术。深受群众喜爱。韩庆堂的“尉公尖”就是其中之一。

高粱秆子店（现名甸子）“画棚子”是韩庆堂创办的。韩庆堂是原河北省唐山专区丰润县岳龙乡于潮庄人。现属天津市宁河县岳龙乡于潮庄。

韩庆堂在一九二〇年来高粱秆子店做卖年画的生意，冬天从老家发年画来高粱秆子店卖，春天回家。到一九三四年前后，韩庆堂又和其侄韩维印来高粱秆子店做卖年画的生意。除年画外，主要是迷信品，如财神、天地、大纸、皂王、门神等，还刷红纸、刻挂钱。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关内外交通不便，物资出入受阻。一九三八年，韩庆堂和其侄韩维印从老家运来“画板”，在高粱秆子店创办了“画棚子”，并落户居住。“画棚子”所用人员有六、七名，都是自家人和亲属。韩庆堂有印制年画的技艺，是大掌柜，主持印制年画。

“画棚子”有裁纸、印刷底样、数色套印、描绘的房间，还有刷红纸、刻挂钱的房间。在描绘房间中安设木架子，一排排的木架上安装“挣子”<sup>\*</sup>，把年画底样和套印的年画附在“挣子”

上面，艺人用各种颜料描绘人物面部和衣着等。分工明确，流水作业，印制成后，送往柜房。“画棚子”的产品主要是草画，也叫“尉公尖”；还有财神、天地、大纸、皂王、门神等。

高粱秆子店“画棚子”的商号为“德庆和”，印制、批发和零售年画。四方百里以内，独家经营，生意较为兴隆。韩庆堂和其侄印制的年画，尽管艺术粗糙、质地不高，但在旧社会农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还是受到当地人民欢迎，为新年增加了一点欢乐的气氛。

到一九四三年，由于日伪时期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各种物资缺乏，“画棚子”也就随之停业了。不过刷红纸、刻挂钱、印制小胖娃娃和一些迷信品多年没停，延续到解放之后好几年。

注\* 挣子：中间一个立轴，轴上装上像扇车翅子一样几十个木框。把要画的底样往上钉，叫挣上，便于一张张翻弄、着色。

## 解放前喀喇沁旗中医中药概况

李万林

中医、中药的研究，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医药学研究的开始。为了生存，人类不断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药王”孙思邈到《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都是医药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我国医学是一个极大的“宝库”。

旧社会，医学理论专门学校不多，广大农村根本没有。中医都是“就医学徒”，拉药橱（调剂）又学医学理论，医、药结合学习，收效益彰。

“医本儒流”，名医多数是饱学或“世家”。群众说，某某大夫“门里出身”，医术高明。其涵意是：行医世家，临床经验丰富，广见多闻，辨证能力高强等等。这也是至理名言。

光绪初年喀喇沁地区已出现大型药店，到民国时已不下十几处。行医人员有二百多名，有名气的中医也不下几十名了。分布在锡伯河、老哈河两大川。集镇地方有中药店，多数村有个人开业行医的小药铺。也有背着药褡子的散医。

全旗大中药店八处。高粱杆子店“永义合”；公谷府四处：“大聚源”、“广茂恒”、“长兴隆”、“德成兴”；王爷府“仁术堂”；旺业甸“德庆恒”；西桥一处。这几处都有批发业务。

公谷府街“大聚源”药店有十八名店员，以批发、零售为主，没设坐堂先生，掌柜三人，劳金五人，买卖比较兴隆。和

“大聚源”对过的“广茂恒”药店十七人，掌柜一人，顶生意的四人。与“大聚源”相竞争。门面柜房修的好，三间柜道、两间柜房，挂着“岐黄事业”金字木匾。后壁挂着六扇，屋内装饰整齐，买卖做的也比较活，一般中成药，丸散膏丹都是自己配制。街西的“长兴隆”药店是赤峰长兴隆分号，门市、柜房各两间，有十多人，设有坐堂先生，以零售为主兼营批发。日门诊量二十余人次。街北“德成兴”药店十几人，靠零售抓外方维持。人员全是河北武安县人。柜房冬夏长期生着土炉子，供来客饮水和病人煎药用，很方便群众。

民国十年左右军阀混战，毅军占领了公爷府等地，吃住在商户，买卖难以维持，关门的关门，散伙的散伙。“大聚源”分家，去小牛群一股，改名为“春生堂”，公爷府一股改名为“复生德”，“广茂恒”分了两处，迁上瓦房的名“广茂恒玉记”，公爷府留下的名为“杏林春”；“德成兴”缩小改为“德生兴”，后又改为“德盛兴”药店，人员增加，生意逐渐兴隆。

伪康德七年成立“汉药组合”，设在现在建平县黑水镇。先交款，一年分两次付货，这样一来，医药业买卖日渐萧条下降。有的关门，有的只能维持人员生活。中医，公爷府街也为数不多，有几位有名气的又不依行医为主。如朱凯山清末秀才，后学中医。还有刘忠武、德庆恒掌柜张汉清等都不专门行医。有权势有钱的人求医，开方不收钱。

名中医郑宗汉，看病非但不收费，每年春秋都配一些小孩药，不收费，群众评价很高。周秀峰、张子忠、姚起泉等是各药店坐堂先生，为一般群众看病。

总之，解放前公爷府地区医药卫生事业极端落后，地方病、传染病遍及城乡，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巫医、神汉盛行，人民健康没有保障。

## 喀喇沁旗蒙医蒙药

李万林 周桂芳

喀喇沁旗蒙医。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执政时期就有四十多名。分布在王爷府、公爷府、乃林的甘苏庙等地。仅就王爷府、公爷府有名望的蒙医就有十儿人。蒙医旦比扎布森，是专给王爷和他的一家治病的医生。贡王在白石台沟门赐给他土地二百亩，作为配药资金的来源。旦比扎布森死后，将医道传给他儿子吐门仓。

当时有名望的蒙医还有：汤土沟的白大夫（达日嘎），大西沟门的乌金宝，白石台沟的白玉贤，福会寺的杨喇嘛，希庄的希克强，普通寺的陈喇嘛，公爷府的肖生嘎等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庙里的喇嘛大夫。蒙医的药品来源：除自采、自制部分，其他大部分是依靠中药店供应。而他们用的药大部分是生的，买回后自己加工，自己调配，装入鹿皮口袋。没有蒙药调剂。如：“金丝木别”是藤本缠线形植物，结圆形果实，生在大树下，缠绕到树梢，秋季摘采，本地现已绝迹。贵重药品如：“红花”是由西藏捎来的，有的也在本地买。

有名气的蒙医乌金宝（梵名胡日勒）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十八岁开始跟随名蒙医“奇达”喇嘛学习蒙医、蒙药的研制，前五年攻读蒙医、蒙药的基础理论，后五年跟随师父行医，在实践中得到了提高。经过十年的刻苦学习和临床实践，蒙医理论较高。经过其师父的考核、证实，允许他单独行医。

乌金宝不仅医疗技术高超，更重医德，走乡串户，好请好接，不计贫富。在抢救危急病人时，昼夜坚持护理，及时地观察病情的转化。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颇得患者和广大群众的赞扬。

乌金宝治疗肝炎、结核有一定专长。福会寺喇嘛王色仍患扁桃体炎，口腔痛疼，呻吟不止。经乌大夫用银针刺破患处后，将淤血吸出，用竹管往口腔内吹药五次而愈。

解放后，乌金宝积极为人民服务。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卓盟自治会主任孔飞亲自主持）于“福会寺”东边建立了“蒙医联合诊所”，并在福会寺院内开办了“蒙医学习班”，招收学员十多名，专学蒙医蒙药。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四、五名蒙医大夫。如：仁亲（现在巴林右旗行医），陈留柱（现在阿巴嘎旗行医），凌凡（现在建平县行医），乌长春（乌金宝之子）在我旗中蒙医院工作。

解放初期处于游击环境，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乌大夫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军民治病。如：王爷府区区长刘彦春患睾丸结核，红肿不能工作。而乌大夫用“乌力出仁亲”（水银）给以治疗，不久痊愈；蒙区区长张全，患肺气肿，经治疗病情减轻。

乌大夫于一九六一年七月病逝于王爷府大庙村，终年七十一岁。

## 中医郑宗汉

郑瑞峰

郑宗汉，字文林，汉族。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喀喇沁右旗公爷府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过私塾，青年时在赤峰学生意。后因双亲相继去世弃商回家务农。

民国廿三年（1934年），公爷府地区缺医少药，又由于家境贫寒，一次郑宗汉的妻子得了重病，就借头毛驴到几十里外去请一位中医先生，没有请动，二次用马去接，还没请来，非用小车子接才能出诊。因病人拖延时间太久，流血过多死去。郑宗汉从此立志学医，并发誓自己学成之后，不论贫富老幼，有请就到，有求必应，决心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从四十七岁起开始自学中医，经过四年多刻苦努力，自学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经典著作和内、外、妇、儿等科知识，开始边务农边行医，义务为民众治病，不取任何报酬，还把自己配制的各种丸、散、膏、丹送给患者服用。后来由于上门求医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从此弃农行医。先后在“民生药店”和“复生德药店”行医数十年。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转为正式职工。

郑宗汉先生勤奋好学，对医术精益求精，特别对妇、儿科疑难病症的治疗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病痛。如公爷府街的陈林、魏和平、邱振国等人的妻子患不孕症多年，经他细心诊治后，现都已儿孙满堂。原工会主席苗如义之子苗树合幼时患重病，经多方医治无效，生命垂危。郑宗汉先生给以精心



治疗，挽救了他的生命。苗树合经常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救命恩人郑老先生。”

郑宗汉先生在晚年每天除接待大量求医的患者外，还抽早晚时间给徒弟和一些青年医生讲授中医课程和作临床经验介绍。并将自己几十年治疗小儿麻疹及并发症的实践经验系统地总结，编写成册，向青年医生传授。他的徒弟韩广庆医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郑老师为人忠厚正直，有高尚的医德，一生中不重钱财，经常周济那些有困难的人，真是有求必应。他老人家从不保守，经常给我们讲述他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我现在治疗妇、儿科方面使用的方剂及临床经验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郑老师给我们留下的。他真是我们的好老师。”

郑宗汉老先生在他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始终遵循自己的誓言，不分贫富、老幼，随叫随到，有求必应，从不摆架子，他不骄不傲，不保守，以高超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赢得了公爷府地区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及同行的敬仰，人民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五四年被评为出席热河省卫生系统中医先进代表。曾多次被评为旗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被选为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医老先生终因积劳成疾，患肺心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五九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

## 中医张景参

王书平

张景参系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下水地村人。原籍是赤峰县柳条沟乡三道沟村。于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张景参的父亲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十岁那年送他到私塾读书，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写简短的诗文。他共读十一年书，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但他没有考取功名的打算，所以在二十四岁那年，就在下水地等处设馆教书。

青年时代的张景参尤其喜读医学书籍，在教课之余，反复地阅读《医宗金鉴》、《陈修园四十八种》等医书。医本儒流，深厚的文学基础为他研究中医理论提供了方便条件。总之，他的成名和他的勤奋好学分不开。

张景参三十四岁开始行医。他谦虚谨慎，根据中医理论反复探讨，临床验证，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医疗水平。由于疗效显著，深受当地群众的好评，他的医风一贯受人尊重。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成为牛家营子地区有名望的中医了。请他看病的由近及远，由平民发展到乡绅。王爷府的王爷也常派小车子请他。锡伯河川上到王爷府，下到赤峰，闻名求医的很多。成名后也不摆架子。不论贫富，他总是按先后次序到患者家治疗，决不趋炎附势。请他时有车坐车，没车骑马骑驴都行，甚至步行也去。这是他名高望重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常说，行医本身就是慈善事业，

有钱人治病，没钱人有病也得治，不能等死。因此，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富豪乡绅，在他那就诊一律记帐（秋后收帐）。秋后有的实在还不起，张景参先生就勾帐结免了，当时的穷苦人家都很感激。

张景参老先生拿手的是妇科和小儿科，外科也能通手治疗。我父亲六十三岁那年，肚脐旁起了一个大包，发炎后疼痛难挨，饮食难进，病势严重。当时农村既没医院，也没外科医生。远处又无法去，我借头小毛驴请来了张先生。这时张景参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诊看后说是肚痈，并说现在包中已经化脓，可以手术，放出脓血，养几天就好了，没啥危险。经他治疗，手术后一个多月就痊愈了，只花一元多钱，我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老先生才好。因老先生爱好诗，我写一首诗表示对老先生的谢意：“先生医理何其精，南北东西大有名。妙术回生人皆晓，延来立刻奏奇功。”

由于五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苦心钻研，再加上他常去赤峰“永安堂”、“长兴隆”等大药店，向一些坐堂的名医们切磋琢磨，谈经求术，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实为我旗锡伯河川著名中医。

为了将他半生积累的经验 and 医术传授下来，从五十岁开始，一面行医，一面教他大儿子张履中（已去世），而后又教大孙子张朋（张履中长子），继后又教他小儿子张执中（现在牛家营子镇医院）。

张景参老先生德高望重，一九三九年八十大寿时，赤峰“德庆恒”、“长兴隆”药店以及牛家营子、土城子、陈家营子和驼店的广大群众给他送了三块匾向他祝寿。匾词为：“齿德俱尊”、“福寿绵长”、“望重耆年”。

张景参老先生于一九四二年九月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

## 名医世家张朋

王书平

张朋系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下水地村人，是名医张景参的长孙，中医张履中的长子。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十岁入私塾，读了八年。祖父张景参依据他性情温和、学业优良，视为继承张家医业的理想人材。于是安排他去药房一面抓药，一面学习《汤土歌》、《药性赋》、《脉诀》等医学基础理论。张景参老先生对他在医学理论知识上精心指导，实际应用上常常自己诊脉后，再让张朋诊断、验证，并要求从病因、治疗方法、药物配伍几方面都讲清楚。在四年的理论与实践紧密配合的学习中，张朋的药物调剂、医疗水平都迅速提高，可以出手看病了。

人伴贤良品自高。二十二岁的张朋有自己深厚的医学理论，又有祖父传授的有效验方，所以出手就来个开门红。虽说不上手到病除，可也一般的病着手就好，名声很快传扬开来。但张景参老先生对他的要求却毫不放松。每当他出诊归来，祖父总要过问，今天遇到哪些病症？开的什么汤加减？有时得到一番鼓励，有时会纠正个别细节和提出弥补措施。如此五、六年工夫，好医生的名声就远近皆知了。

张朋主治的是妇科，但由于他精心钻研，内外科也能通手治疗。如本村高云峰患胸膜炎，在赤峰治了很多日子，花钱五十多元未见效，张朋用了三付药，只花了几元钱病就治好了。下水地王玉文手心长一疔疮，别的医生都说很危险，不好治。后来张朋

给他一贴膏药，几天后疔疮烂掉，十几天就收口愈合。更使人信服的是，唐家栅子郝玉堂之妻连生三个女孩，夫妻盼儿心切，后来妻子怀孕怕不是男孩而担心，就请张朋给诊脉，张朋仔细诊断后说：“这回保证是男孩，并且是双胞胎。”结果和张先生说的丝毫不差，从此人们都称张朋为“神医”。

伪满初期张朋自己开业行医，兴盛一时。他继承祖父医德医风，对待患者有求必应，不摆架子，不卖假药，对人诚恳。更受人们尊重。

一九五五年被调到喀喇沁旗医院工作，任中医主治医师。医院遇到的疑难病症，均请张朋主持会诊，并提出治疗方案，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病痛，深受广大患者和同行们的好评。

张朋先生于一九六八年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 中医田向阳

张云岫

中医田凤九，字向阳。生于光绪廿四年（1898年），祖籍辽宁凌源。兄弟三人，老大名不详，老二田凤山仍居原籍，田凤九为老三。

他两岁时母亲病故，因家境贫寒，被其父送人。时隔不久，又被其祖母要回。确象古文《陈情表》叙述的那样，和祖母相依为命，在祖母的精心哺育下长大成人。念了三年私塾，人很聪明，十三岁时由他姑母（凌源“天生堂”药店东家）做铺保，送往现在马蹄营子乡山嘴子村“德兴永”药铺学徒。

田凤九在学徒中肯于钻研，天资聪慧，攻读药书理解甚快，干杂活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受大掌柜的青睐。“德兴永”药店的房东张福春是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很喜爱少年时代的田凤九，常夸他好学，聪明有出息。田又有敏而好学、不耻多问的精神，常常请教于张福春老先生，因而进步很快。

功夫不负有心人。教者无私，学者刻苦奋进，经过八、九年的努力，二十一岁开始行医治病了。

拉药橱出身的田凤九，不仅识药种类多，而且对药的功能又很有研究，在调方配伍上胜人一筹。精读过《四百味》、《本草纲目》、《脉诀》、《临床辨析》、《医宗金鉴》等经典医书，有较深的医学理论基础，所以在诊脉断病上深得病人赞许和钦佩。他诊脉后，对病的起源、疼痛的部位等，从理论到病人的感觉都说的清楚而准确。他的口头语是：“开个方，吃两付药就好

了。”病人都说：“田先生就是脉息好！好象病在他身上长着一样。”精神治疗的效果是很高的。行医不长，就已成位远近百里知名、马接车送的“大先生”了。

不久自己开一所药铺，字号“荣生堂”。收了两名拉药棍又学医的徒弟，一名是凌源来的杜云昌，一名是现元宝山区西六家的仇承德。经田凤九先生三、四年的指点，后来这两位都成了很好的医生。解放初，田先生参加了“联合诊所”。当时，我旗领导人中有患疑难病症的，经常把他请到旗里来会诊。

六十岁后，声望更高了。几百里以外的病人也常常慕名而来求医，有时患者住在他家里，吃饭、煎药从不厌烦。为了把医术传给后世，又收了宁城的白凤翥为徒弟，同时让其孙田跃宗跟他学医。经几十年的实践，他在晚期非常强调“临床辨证，灵活处理”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医疗原则。这应该说是田老先生行医一生总结出来的经验。正如俗语说：“病有千变万化；哪有照着医书长病的。”

田老先生于一九七六年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

## 外科中医于凌旺

朱家骥

于凌旺，喀喇沁旗四十家子乡大柳条沟人。光绪廿二年（189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四岁丧母，和伯父生活在一起。十四岁开始放牛羊，但他非常好学，每天拾柴换来纸笔书籍，夜晚就读于灯下。他读书、抄书很下辛苦，他更喜爱的是医学书籍。因家中贫寒很难有钱买医书，他的妻子希望自己的丈夫将来有所成就，每天为他人做些针线活，积攒些钱，托人到赤峰、北京等地捎来一些医书，供丈夫刻苦攻读。读书遇到不懂的地方，不管路途多远，也一定向他人求教弄懂。年青好学的于凌旺，听说公爷府有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肖生嘎，想往就学。但又听说这位医生脾气很古怪，一般人不易接近。为了求教于他，想了很多办法，乡里谁家有病人，他就赶紧替人家去请肖生嘎医生。这样一来二去，他就和肖先生渐渐混熟了，肖先生一般有什么事情都叫于凌旺去跑。在较长时间的考验后，肖先生觉得于凌旺是个诚恳、好学、求上进的青年人，便把自己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验方传授给他。经过肖先生的精心指导和于凌旺本人长期不断地钻研实践，医务水平提高很快，不久便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和赞誉。他不但对中医外科有专长，对中医内科也有了高深的见识。为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水平，他常常到四十家子向于景臣老先生请教。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肖、于二老先生的指教，终于成为一名技术高，有医德，深受广大群众尊敬的有名望的外科中医。



于凌旺先生一九二六年开始行医到一九五一年，在这二十五个年头里，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为群众治病从不间断，从不要一点报酬。解放初期，每逢公爷府集日，他就步行到“杏林春”药店给群众看病开方，只挣一点方费。一九五二年在旗卫生科领导下，四十家子乡成立了中医联合诊所。成员四人：白仲阳、于凌旺、崔风廷和朱家骥。一九五八年改建为四十家子公社卫生院。

于凌旺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九五二年他在平庄集训学习二十多天，散会后步行归家。平庄到大柳条沟一百六、七十华里，又逢天降大雪，由于途中劳累，到家后嗓子哑说不出话来。刚想休息一会，四十家子社员杨德清得急病来请，于大夫不顾自己病情和旅途劳累，立刻就去杨家看病。

杨德清大腿肚子青肿得大碗口粗，曾到外地医院就诊，医生要他做截肢手术。杨不同意，就回到四十家子等死。听说于先生回来了，便将他请到家。于先生看过后，确诊为“青蛇毒”，使用针刺患处，刺出黑紫血后，用黄柏粉加新鲜豆腐捣成糊状敷之，内服“仙方活命饮”，用后疼痛骤减。治疗二十余日，杨德清便痊愈了。

于凌旺先生、白仲阳先生各有专长。白仲阳内科很拿手，深受患者的信赖。他俩遇见疑难病症经常商讨，会诊开方，效果甚佳。一九五六年流感很普遍，病势蔓延严重，很多社员病倒不能劳动。于、白二位先生通过会诊，商讨拟定处方，用银翘散加生石膏、麦冬、花粉等药物，轻者用粉剂，重则汤剂，服后即愈。

一九七二年，于凌旺先生年已古稀，但还是带病坚持工作，直到卧床不起。于同年医治无效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

## 中医高新

高克

高新，喀喇沁旗昌盛远乡甸子村人。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排行第五，人称高五先生。

少年从师于朝阳名医刘备亭学医（解放后刘备亭先生在辽宁中医学院讲学），受名师指教，颇得真髓，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造诣很高。其后，又善于深究中医理论，在他行医的几十年中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验证了好多古方金鉴，因此，对许多疑难病症都有独到的见解。难能可贵的是又把这些良方妙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的徒弟们，为高粱杆子店地区中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解放后，高新怀着为人民消除疾患的愿望，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筹集资金，成立了甸子卫生所。他不仅是卫生所的组织者，也是最早加入卫生协会的会员，还是经热河省最早定职的中医。在党的领导下他焕发了青春，不分黑夜白天，刮风下雨，随叫随到，尽职尽责，一心为群众解除病痛，表现出一个医生的美德。名声很快传扬开来，东到辽宁省的建平县，南至宁城，西至楼子店川，北至平庄一带来求高五先生就医的人常常不断。有些久治不愈的重症和垂危病人，经高五先生治愈的不胜枚举。

他治病不因循古方，不守陈规。能辨证治疗，深受同行们佩服。甸子村民韩林华胃痛、腹胀、大便不通，经四个医生运用消

导法治疗长时间不见效，高五先生一剂见轻，两剂则愈。后来同行们谈起此病例，高先生风趣的说：“冬天钢笔不下水，烤烤就通了！就这个道理。我在原方上加了肉桂、干姜。‘寒则凝滞，塞而不通，温则解矣’。”

杨殿志患中风，右半身瘫痪。高五先生接手之后，只用“黄芪五物汤”，及时巧妙的加减一两味药就治好了。杨殿志一直活到八十余岁。

他治病还讲究“除恶务尽”的法规。高丛右腿外伤，七天后发生阵发性牙关紧闭，角弓反张，二目天吊，时时抽搐。经盟医院确认为“破伤风”。按当时条件已属绝症，有的医生认为病已确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高五先生却说：“当医生的‘当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人没死就得治，有口气就有治的可能，要坚信能治活。”他运用了针灸、打针、汤剂等多种疗法，终于使高丛转危为安。接着又有人以为，病已愈，“勿令太过，恐伤其正也”，高五先生却又说：“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勿令死灰复燃！”至今高丛已年近七十，仍耕耘在农业第一线。

高新常说，独到的诊断，来自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根植于实实在在地望、闻、问、切的四诊。

他还说，当医生要尽量让人花钱少治大病，用平常的药，治不平常的病。药品来之不易，既要节省，又要对症，量到即可。他一生就是这样，对医术精益求精，推崇和追求高尚的医德。难怪高粱杆子店地区的人们在中风病人较多的今天常常会说：“中风这种病要是高五先生还健在，一定能治好的！”

他不仅律己严格，教人也是如此。要求徒弟们吃苦耐劳、勤俭创业、力求上进。他治学严谨，常把“不学勤，不学俭，焉能望富贵！不习文，不习武，不能登高科”作为格言，让徒弟们牢记心中，时刻勉励自己。高五先生的医疗艺术和他的高尚医德，

至今仍为许多人传颂着。

高五先生卒于一九六五年，终年七十六岁。

## 王爷府“公医”诊所

木 斯

伪满喀喇沁右旗公署设在王爷府（王爷衙门西院）。当时，贡王之子笃多博正在日本留学，由邢宜庭自任代理喀喇沁右旗旗长。旗公署通过关系于一九三二年从赤峰请来一位日本大夫——中村秀雄（日本广岛医科大学毕业），住在旗公署门前南边三间瓦房里，即是住宅，也是诊所。他是旗公署专用大夫，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公医”。

中村大夫当时虽然是“公医”，但王爷府上下川的老百姓，只要找上门来，他是有求必应。总是负责地检查、诊断、给予治疗。因此，在王爷府一带很有声望，受到各族群众的赞扬和尊重。

中村大夫会说很流利的中国话，爱好中国古诗、书法。我认识中村大夫是在一九三五年，因我的家里住着两位日本人，他们是伪满军驻王爷府骑兵第三连中尉教官，一名安永俊雄，一名牧野中男。中村大夫和他们常有来往。我是房东，又是个小学生，时常在他们屋内出入，因此混得很熟，什么话也和我唠。我母亲有病时，找中村看病，他也慨然应允，结下了友情。他还时常劝我母亲不要抽大烟了。

中村大夫虽然留有两撇“仁丹胡”，看样子似老头，但他当时只有三十来岁。待人忠诚，生活朴素，他家里雇用一名叫“簸箩”的半聋半傻的中国人，这个人没家没业，每天给中村做饭、

洗衣和管理家务，人们都叫他“仆役”（日本话）。由于他忠实可靠，不辞劳苦，中村大夫同他也很和睦。一九四一年春，“簸箩”突然病倒，据中村说是“肝炎”，已到危险期。中村大夫为了抢救他，特意从奉天（现沈阳市）买来贵重药品给他治疗，经过一年多的精心诊治和细心护理，使这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恢复了健康。当地的人们都说：“‘簸箩’的病，若不是老公医，早死了。”

一九四一年秋，旗公署迁至平庄，中村大夫仍留在王爷府。他既给老百姓看病，又是王爷府崇正国民高等学校的校医。一次学生突然感染上伤寒病，日本人称这种病叫“肠室肤斯”，病状是腹泻、发高烧、长期不愈。病倒四、五十人，病情蔓延，药品供应不上，死亡三人，有生命危险的二十余人，中村大夫也束手无策了。在病情蔓延期间，王爷府警察署得知消息，声称：这种病传染性极大。要把学校包围起来，命令校长把所有患病者抬到郊外以火焚之。全校学生听到消息后各个惊慌失措，哭声不绝。最后由中村大夫出面交涉，并保证一定想办法抢救，绝不叫病情蔓延，把街上各商店卖的“蝇必立死”喷雾液，全部买光，并对患者实行隔离。经过预防、治疗，入冬后病人逐渐减少。全校学生深为感动，外地学生的家长也都来看望，并对中村大夫这种负责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驻在王爷府一带的日本人（伪官吏、伪满军的军官、宪兵、及其家属），有的事先逃跑，有的被伪军和群众打死。而中村大夫由于在当地群众中留下较好的印象，没受到打击。当时患病的邢宜庭为了以后继续治病，在人慌马乱中把中村大夫和他的亲人隐藏到大营子后山摇头沟农民王才家里，由“簸箩”为他们奔跑谋生。还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解放当时，我的妻子分娩，生了个怪胎，中村大夫治疗和

护理了一个多月，才完全脱险。使孩子的母亲在后来生育上没有留下后遗症。

一九四六年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建西县和喀喇沁右旗人民政府相继在王爷府建立，旗、县支队也成立起来。县支队政委王克同志得知“老公医”还在，就把中村大夫请回来，要他继续给支队的战士和当地群众治病。在药品缺乏和没有医疗器材的情况下，中村大夫就用土办法为患者治病。他曾说过：“当医生的只有解除病人痛苦，千方百计想办法把他们治好，就是我的宗旨，其它我不追求。”

在这期间，中村大夫的亲人中岛健子由于折磨、劳累已卧床不起。中村说她是“痞积病”，并说：“眼下药品困难，只有想尽一切办法给她治，如果治好，我们还有可能共同回国。”

一九四七年春，病倒在床上半年多的中岛健子终于去世了。我和大营子村长孙进财以及中村大夫的邻居共同凑置了棺木，把她安葬在南山。在安葬前，中村大夫把中岛健子的发髻剪下一绺，对我们说：“我将来回国后，把她的这绺头发安放在家里，以示怀念。”

一九四七年秋，热河省人民政府把中村大夫接往承德。一九五〇年我到省文联文训班学习期间，得知中村大夫在省立医院工作。我到他家看望他，他的精神很好，对我说：“政府对我很关心，很照顾，叫我担任门诊部主任医生，很信任我。”又说：“政府把‘簸箩’安置在胶鞋厂工作，我很感谢共产党！”

一九五二年中村大夫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他的愿望和要求已被上级批准，很快就要回国了。

以上说明，尽管日本法西斯罪恶多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还是源远流长。

# 我的舅父——博仁特古斯

汪云生

博仁舅父生于一九二三年，现年六十五岁。祖籍赤峰市郊区安庆沟乡元茂隆村大烧锅地屯。而博仁舅父却出生于元宝山区建昌营乡昌盛沟村。外祖父鲍金祥是翁牛特旗公爷的嫡支，所以也在贵族之列，但到外祖父这一代已没落。每年以收地租为生活来源，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八年前后。

外祖父的岳父没有儿子，年老了就将外祖父一家接到建昌营乡昌盛沟村，所以，博仁老舅于一九二三年就出生在此地。外祖父共生有三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老四，比博仁舅父大八岁。他在弟兄中排行老三。博仁特古斯就是自幼起的蒙古名。

我的外祖父鲍金祥壮年时，自己种园子，养着几头牛，二、三十只羊，加上收地租，家庭生活还可以。后来，大舅、二舅相继成家结婚，家业就由他俩支撑。这俩位舅父自幼未经艰难，清闲自得，因而染上吸鸦片的恶习。不但他们俩人吸，两位舅母也都吸鸦片成瘾，家中的事务不着心治理。所收租粮不抵鸦片的消耗，几年时间，家庭生活就陷入窘境。幼年和少年的博仁舅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读书的。

## 一、学习成绩一直优秀

博仁舅父八岁至十三岁，（1930——1935年）在本村私塾就读，当时家境尚可，那时姥姥还在世，我母也未出嫁。十四岁



(1936年)离家到几十里外的赤峰读书，在校吃住。只能吃最便宜的饭就咸菜，手中很少有零用钱，穿的和富家子弟就更不能相比了。也就被那些富家子弟瞧不起。但学习成绩总在他们前面。此时，大舅或二舅去赤峰看望他，下馆子吃上一碗饅饅，给留下一两元零用钱，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十七岁(1939年)毕业于伪赤峰国高，毕业后回家住了半年多。这时，我母亲与我父亲结婚一年多了。母亲见老舅学习成绩优秀，半途而止，深感可惜。就与我父亲商议，领老舅到张家口读书。舅父十八岁那年七月随我母亲到张家口，在家中补习没学的科目。十九岁(1941年)二月参加蒙疆政府选拔留日学生考试，成绩合格，三月入留日学生预备班，攻读日文。二十岁(1942年)五月，从预备班毕业，当年七月去日本进入留学生行列。

舅父在张家口学习期间，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吃住。学习之余，和我们游戏，教说话，教数数，认字等，我们特别听话，感情非常好。

## 二、又接到了舅舅的信

一九四四年七月回国来我家住一个多月。母亲见时局动荡，有心想留舅父站下，但因学业未成，舅父又毅然出国继续学习去了。原初舅父是学医的，后来感到祖国政治、经济上更为需要，又改学法学了。舅父回日本第二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断绝音信，是多么牵肠挂肚啊！

一九五〇年七月的一天，村政府秘书给送来一封自日本寄来的信。信中写了舅父对我母亲、外甥们的问候以及他的近况，这对我们全家是莫大的安慰，母亲高兴得流泪不止，我们都说：“又看到舅舅的来信了”。但从这以后，又很久没有来信。

### 三、组建东京华侨总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三年舅父第一次回国。送回被日本统治中国时期抓去日本的劳工——刘连仁回国。在北京与我妈妈又见面了。舅舅告诉母亲，他在东京华侨总会工作。并说，华侨总会是旅居日本的中国同胞自己的组织。这个总会是在中日关系对峙僵化时，舅父与其志同道合的爱国侨胞共同创建起来的。侨居日本的华人达四万多，分布于日本的各个岛屿，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舅父在创建华侨总会过程中，几乎走遍了日本所有的华人居住地方。通过多种关系与当地政府联系通话，争取各界友好人士大力支持，终于组织了核心。有了总会，还要组织兴办华侨集体的各项事业（教育、新闻出版、商业等），这些还要靠众华侨的集资捐助，为此舅母（日本人）拿出了自己家产的很大一部分。她拥有“大贺商事会社”、“东方旅行社”、“燕京饭店”、“赤峰产业株式会社”等，她任总经理，与各界人士联系需花很多钱，买礼品馈赠，这些都由舅母的企业支付。舅父曾对我们说，他自己的收入并不够他这整年整月的在外奔波联络的花销，还要家里拿许多补贴，而你舅母对此毫无怨言，不惜血本百般赞助，这是很难得的。

总会的各项事业终于相继办起来了，使众多华侨与当地的纠纷都能得到合理解决。博仁舅父多年任总会理事、副会长等职务，为华侨的利益和尊严，为祖国的声望工作着。在中日两国没建使馆机构时，总会从中为之联络、接洽协商作了些工作。如：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多次送归战前留日的学生和被抓去的劳工回国，又接回日本人。一九六四年送回台湾运动员马晴山、陈觉等。总之，华侨总会的建立受到日本政界中和民众团体中众多希望日中友好的人士的大力协助和赞赏。

#### 四、人要勇于进取

一九六四年四月份，舅父借办事之机，第一次归家探亲，来到赤峰宾馆，叫我们所有亲人去聚会。以后每隔二、三年就来赤峰，有时到我家中看看，这样见面的机会多了，谈话中我们问及日本的工农业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等问题。舅父告诉我们：日本的工农业是很发达的。工人、职员的工资很高，生活上吃穿都不愁，但是，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侨民，每人每天都是忙忙碌碌，车水马龙，来来往往，很少见踱方步漫游的人。企业间竞争，人与人也在竞争，每个人必得有良好的教养，有较高的业务和文化水平，并且还须不断学习上进，才能不失业，才能过上优裕的生活，才能被人瞧得起。所以，人人都在努力学习和工作，否则是没人聘为职员的。日本的国情特殊，人多地少，工农牧业等用人根本没有侨民的份。因此，华侨世世代代都靠做生意生活。生意也并不好做，搞不好就要被挤垮吞并。为此，我们的华侨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华侨子女自幼就加强就业准备的教育。办了多种企业，使华侨都有所处，不致乞讨。虽然如此，终有天灾病业的意外袭击，这时华侨间就各自量力负担。多年来我家每年总有多人在家闲吃闲住，治病、供给上学、等待安置就业等。接着又勉励我们说：“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专业技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万不能靠乞求于别人生活，要勇于进取，勤奋扎实地工作。”

#### 五、给祖国、家乡培养人材

改革、开放以来，博仁舅父对祖国科技人材的培养尤其关心。一九七九年秋，在北京华侨大厦同我等谈话时，曾十分惋惜

地谈到我国武钢引进设备一事说，我们国家是多么需要外汇！要把外汇用在刀刃上。我们的科技水平受到限制，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设法多派出留学生和考察团。在这前后，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具体协商了出国考察团和留学生的问題。舅父通过本人努力，多方联系，为我们内蒙几次特别派出留学生多人次。一九八五年四月间，日本爱知县稻泽市派代表团来我赤峰市考察，由于我们方面的日文翻译人员水平关系，翻译双方的谈话相当困难（当时我们也在场）。事后舅父说，这种场面使我太窘了，我们要设法解决这一问題。因而，舅父回日本后很快办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份在北京期间，通知赤峰市办理选派人员的一切手续，学习人员在日期间的所有费用由我舅父和另位爱国华侨共同负担（该人是台湾退役的高级军官，原与舅父并不融洽，但一提此事，他慨然允诺）。培养一、二年回国，将对我们吸取先进科学技术和友好往来创造更有利条件。

## 六、促结友好

舅父胸怀为祖国争光做贡献的愿望，始终不渝。近几年来，为内蒙古扩大经济贸易、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终年不知疲倦地往来穿梭着。先后为内蒙古的海拉尔市、呼和浩特市，在日本众多城市中，选择对应的缔结友好城市。赤峰市和日本爱知县的稻泽市不久也将缔结为友好城市。

一九八五年四月在赤峰市，我们向舅父问及关于缔结友好城一事时，舅父曾说：“从双方角度衡量，我们方面更需要技术和设备，希望合作办些事业，日方并不热心此事，认为没什么大利可图。为寻找姊妹城，我几乎跑了半个日本。通过关系，多方面敦促。在联系的过程中，对我本人来说虽然遇些困难，花些资金，

但想到此事关系重大而久远，我心甘情愿。”一九八五年五月，舅父被聘请为赤峰市经济顾问。



一九七一年秋季广州交易会期间在流花公园  
左：鲍凤阁（笔者二舅父）中：博仁特古斯  
右：笔者母亲  
汪云生提供

## 七、深情的话语

这些年来，舅父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不论在书信中或是谈话中，对我们的工作、学习、风度修养各方面都亲切关怀。早在一九六四年见面时就一再嘱咐：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要参加劳动。你们的生活要保持在大多数人的水平上，不要特殊。要自立更生，不要有所依赖。我可以给你们钱，但给你们多了，你们会变懒，会腐化，变得奢侈，那我就是害了你们。家庭如果有了特殊需要，可以向我要。至于你妈妈和你二舅花的钱，他们用多少我给他们多少，我健在之年可以保证，我没了，有你舅母也是照常的。你们要搞正当的生财之道，不要作违法的事。去掉幻想，不可存侥幸心理。你舅母就是每天工作到深夜，回家还要做饭，次日上班前还要做洗衣等家务活，很辛苦。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对我们是勉励，也是规戒。

在学习和修养上，也是见到就指点的。我们从他老人家身上学到的也不少。有客来访或出外会客，总是衣冠整齐，头发梳理好，朴实大方。与客人见面或告别非常注意礼节，既热情大方，又不卑不亢。即使是很熟的朋友也是彬彬有理。教育我们说：“日本人讲究礼节。”又说：“我国从古代就称礼仪之邦，你们一定要着重这方面的修养。无论对上级或下级，都要不卑不亢，适可而止。谈话要有条理，不要罗嗦，加手势不要张牙舞爪，穷酸不稳。人家说话要注意听，可不能抢话……”有时亲自示范：男子怎么坐着，怎么站着，女子应怎么坐立等等。一次我们陪客人谈话，我们中间有个人打个盹，客人走后，被舅父训教一番，说这是失礼。如果来困，可以到寝室去睡。还有一次在宾馆一同去进餐，哥哥不慎在走廊吐了一口痰，他老人家立即劝告说：“这是不文明的习惯，今后不要随地吐痰！”这些深切的教导，使

我们久久难忘。

## 八、东方国际旅行社

舅父舅母在“燕京饭店”、“赤峰产业株式会社”等生意的基础上，一九八〇年又办起大型“东方国际旅行社”，与国际友人更广泛接触，向国际友人介绍祖国名胜古迹，秀丽山川，雄伟壮观的长城和风景如画的泰山等，尽多地争取他们来祖国旅游观光，考察访问等。最近几年，舅父往返于中日航班线上，每年都要占去多部分时间。在联系业务中，与祖国的旅游局、外事、侨委等各方面关系都非常融洽，彼此间无拘无束，一切都直截了当。把有关旅游接待服务方面的所见所闻、存在弊端、改进意见，总是风趣的毫不客气地提出，共同研究改进。表现出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

## 九、侨胞同祖国人民命运相连

在那十年动乱的岁月，日本华侨小将们也起来“造反”了。也要总会的元勋们靠边站！老华侨们虽不能容忍，但一时也无可奈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归原路，也是和祖国形势相连的。

后来，舅父曾多次组织华侨青年回国观光，让这些华侨后裔接受爱国精神的熏陶。一九七一年就组织了四、五十人的归国参观团。带他们到韶山、延安等地参观。

一九七三年九月，舅父率旅日华侨代表团归国参加国庆活动，受到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等的热烈欢迎。革命老前辈遭受迫害，华侨痛心。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他们组织庆贺。几万名华侨和祖国人民同舟共济，和祖国人民命运相连啊！

## 十、年逾花甲，魄力尤存

舅父每次回国，不论是和各级领导谈工作，还是和朋友叙旧，或是和亲属话家常，他的精神始终饱满。迎来一批，又送走一批，毫无倦意。为祖国为家乡的进出口贸易牵线搭桥，尽心尽力，想尽办法促使成交。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广交会差不多每年都参加，每次都带旅日华侨商团（20—30人）前来参观洽谈订货。除此外，与舅父要好的日本朋友也找他协助参与谈判。我所知道的谈判成交品种很多，如蕨菜、兔肉、绿豆、荞麦、马肉、绒毛、皮张、巴林石工艺品等等。

除在展厅、交易会场工作之外，回到旅社也是应接不暇。客人不断，座无虚设。我们前去与老人家团聚的亲人，只好挤在晚上睡觉前叙谈家常了。尽管如此，往往也还有不约而至的客人给“搅了局”。但我们深知公事重于家事，只好暂时悄然避开。待客人走后，我们以为舅父一定很疲倦了，但他总是坚持同我们兴致勃勃地谈下去，常以酒助兴，一直谈到午夜。次日还是照常起床，洗澡，有时还到室外跑步活动。我们都为老人家老当益壮、精力充沛而感到欣慰。也使我们联想道，十几年来，他总是受到广大旅日侨胞的尊敬和爱戴是顺理成章的。

## 十一、回来否

一九七八年在赤峰与舅父见面时，问舅父是否可以回来在国内工作时，舅父说：“我也想回到国内来工作、定居，孩子们也好回国来落地生根。但此事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我曾和廖公（廖承志）请示过，他说那里更需要你，国家需要你这样做。另外，从我本身也有一定困难。你舅母是日本人，孩子们都生长在



日本，在那里生活习惯了。回到祖国，一则他们短时期适应不了，另则也牵挂那里的亲属。都回来也会给国家增加很大的负担，安置华侨不像安置国内人员那么容易。我们的国家目前经济上有一定困难，如果许多华侨都要回来，国家的负担就太大了。还是这样吧。只要有爱国之心，给国家做贡献，不一定非要在国内吗！”

这番谈话，使我们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道理。

舅父对内蒙古自治区，对家乡尤为关怀。一九七九年曾为内蒙古赴日访问团出国前的准备当参谋，帮助筹划。巴图书记（他的老同学）也专程去北京同舅父商议此事。

我国赴日的访问团、考察团，只要他在家都要接待，做向导。

舅父始终为中日友好，为振兴中华而操劳、奔波着。

## 英名永存

张云岫

乃林镇火车站前，矗立着一座庄重、威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当霞光照射在塔顶端时，吉郑兴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要放出异彩，崇敬、眷恋之情油然而生。这位建平县（后划建中县，包括西桥、楼子店、乃林和平庄四个区）县委副书记吉郑兴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革命者的热血，永远滋润着我旗大地，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也永远激励着奋发向上的喀喇沁人民。

### 抗日先驱——吉郑兴

吉郑兴原名吉偶，化名郑兴。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生于河北省滦县榛子镇杨柳庄。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生性聪明，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节衣缩食供他念了四年私塾。大约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在杨柳庄教私塾。每逢集日还去粮食市给买卖粮的人过斗，靠“格子粮”维持全家人生活。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炮响，抗日战争开始。杨柳庄离家很久的秘密共产党员吉恩龙回到杨柳庄，经他介绍，吉郑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李运昌领导的便衣队。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过冀东大暴动等许多革命活动。以后，相继担任过杨柳庄党支部书记，大暴动后当了迁（安）、滦（县）、丰（润）联合县八区的中心区委书记。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反抗汪伪自治，反抗治安

军。一九四四年十月，吉郑兴被任命为迁（安）、卢（龙）、青（龙）联合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四五年二月，参加冀热辽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奔赴东北接收伪政权，吉郑兴与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民政科长刘佐彬以及女儿吉淑贤开赴东北。在平泉被热中地委委任为中共建平县委副书记，刘佐彬为建平县长。并命令他们火速接收敌伪政权。

### 接收伪喀喇沁右旗公署政权

崔建舟同志生于一九一九年，现元宝山区平庄镇毛家窝铺村人。一九四一年，在冀东革命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派回东北热河老家做地下工作。当时，伪喀喇沁右旗公署设在平庄。平庄距毛家窝铺十二华里。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解放这段时间，崔建舟和在平庄地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白崇武取得联系。他们对伪喀喇沁右旗警务科的警尉李心平、李荣春展开工作，多次教育他们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绝，不要做恶过多等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当崔建舟同志得知日寇末日已到，为了我党能尽快接受政权，就主动雇一个名叫刘万寿的人给承（德）平（泉）建（平）办事处周治国同志送信。信的内容是请他早日派人来接收平庄伪政权。刘万寿到叶柏寿遇见八路军部队，就把信交给八路军部队领导人。部队当即和地方行政部门联系。正好，由十八地委委任的建平县长等人也来到部队。这样，吉郑兴、刘佐彬、郑武、潘中、张泽林、于秀华和刘彦春等二十余人，于一九四五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来到毛家窝铺村崔建舟家。

喀喇沁右旗警务科李心平、李荣春曾多次接受过崔建舟等同

志的教育，日伪一垮台，二李就到崔建舟家报告了伪旗公署的一切情况，并表示愿为八路军接收伪政权效劳，由他二人为首组织了维持会。当吉郑兴、刘佐彬等到达后，崔建舟就把李心平、李荣春找到自己家，并把刘县长等人介绍给他们，说明接收伪旗政权的意图后，大李、二李（这是平庄地区群众对他们的称呼）表示愿意效劳。因此，一九四五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在平庄比较顺利地接收了伪喀喇沁右旗公署的政权。当天，将伪旗公署和维持会的牌子摘掉，换上了“建平县人民政府”的牌子。

## 远见卓识

政权接收以后，主要工作是：维持地方治安，建立人民政权和武装；收缴日伪物资，支援战争等。首先是搭好县、区骨架。以伪喀喇沁右旗原管辖范围建立十一个区政权。一区叶柏寿，区长仇瑞华；二区小塘，区长李云山；三区朱碌科，区长王明远；四区老建平（新丘），区长李明光；五区黑水，区长于秀华；六区平庄，区长张泽林；七区西桥（包括楼子店），区长白玉堂；八区公爷府，区长马生；九区王爷府，区长刘彦春；十区旺业甸，区长高林；十一区毛沟七家，区长巩××（根据崔建舟同志提供资料）。并收编敌伪军警人员，建立武装县支队。

随同吉郑兴和刘佐彬一起来的二十几名干部，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冀中，他们有战斗经验，会打仗；有的来自老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他们有发动群众的丰富经验；有的来自革命圣地延安，革命理论水平高。这二十几个人的队伍，接收若大个地盘，显得太不足了。所以接着是立即着手自己培训部分干部，为全县培训出骨干力量。

吉郑兴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冀东地区就注意发动群众，培



吉郑兴和他的两个女儿

张云岫搜集提供

培养发展优秀分子入党，为革命培养过不少的人才。建立鲁新庄第一个党支部，组织过“报国会”、“妇女会”、“报国队”（武装民兵）、“儿童团”等等，也重视对上层人物搞好统战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政权骨架搭好以后，立即着手办了两期短期干部训练班，多数是平庄一带制砖工人（当时平庄有串窑）、扛长活的、青年学生以及少量伪职员等一百多人参加。吉郑兴同志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本教材，分专题亲自讲

授。讲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和胜利的伟大意义，建立人民政权迫切性和工作任务。从当时的艰苦环境，讲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学员们深受启发，提高了阶级觉悟。两期训练班结束，有三十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学员分配到各区，在建设新政权中都起了骨干作用。如：乃林区长田增地，楼子店区长刘振江等就是这个时期培养成长起来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县委书记陈光又带一批关内干部来到平庄。这时，才正式建立了“中共建平县委员会”。陈光为县委书记，吉郑兴为县委副书记，刘佐彬为建平县长，崔建舟为公安科长。

清理收缴敌伪物资，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对于敌伪物资的收缴，政策界线分明。日本投降后，平庄大部分物资被附近老百姓抢走，几乎是没剩什么，也就未予追究。只对伪官吏凭借势力强占的物资，有重点的加以收缴。概数是：收回大烟土两千多两，大小枪支一百余条，伪“鸦片组会”的“组合布”一部分。都做为军需品输送给部队。

政权基本稳定的间隙，立即在部分地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巩固人民政权。一九四五年十月，吉郑兴同志带两名通讯员和一位姓罗的部长，在平庄区山嘴子进行减租减息工作。住在谢殿卿家，分别找张××、石××，向他们讲八路军的主张，铲除剥削的道理以及革命发展的形势。又进一步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中国如何向前发展等。经教育后，他们各拿出一万斤和四千斤粮食分还给贫苦群众。在山嘴子召开了上千人的大会，吉郑兴同志做了报告。这次会，对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 建平县划分，开展游击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农历腊月十一日)，国民党十三军占领了平庄地区。我建平县政府立即转移到平庄西头道营子、十家、楼子店以南山区、公爷府等处活动。根据热中地委指示，建平县委在楼子店东南山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国民党侵占平庄前后的经验教训，确定下步方针是：坚持岗位，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伪官吏进行清算斗争，对个别反动大地主严厉打击，鼓舞群众，支援解放战争。

针对国民党侵占平庄和我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经请示上级同意，将建平县东西长二、三百里的地面，按地形划分：老哈河以东划为建平县；平庄、乃林、西桥和楼子店四个区划为建中县，县委书记吉郑兴（据李士英同志介绍说，吉郑兴同志这时已是县委书记）；毕家坝以西划为建西县。这样既便于上级及时指导工作和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更便于及时掌握各种情况。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建中县又并入建西县。蒙汉机构合并。

## 为革命献出最后一滴血

一九四六年六月，吉郑兴同志去承德开会回来时，坐大车摔伤了腿。在赤峰治疗一段时间，伤势稍有好转，又回到建西县工作，依然需要拄着拐杖，因而要有人照顾。组织上就把他的女儿吉淑贤从干校提前招回来照顾她父亲。

吉郑兴回到西桥后，就又走门串户，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了。当时，为了便于活动，经常一个人出入各个村庄。农历九

月下旬的一天，吉郑兴住在西桥的朝阳沟。有人报告说，地主还乡团来了！他沉着地烧毁文件，向四间房方向转移。牯牛营子村有个地痞流氓王喜贵，外号人称“胎里坏”、“三小鬼”的，向匪首张爱仲报告了吉郑兴同志的行踪，张带土匪马队追赶。当吉郑兴同志走到沙坝台西沟岔时，发现敌人追袭，就钻入高粱地隐蔽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中两弹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九岁。

当地群众用芦席卷好尸体掩埋了。事隔很近，吉郑兴的女儿吉淑贤在三十家子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突然听黄土梁子去的一位干部说出吉郑兴牺牲的消息。吉淑贤当即要求把尸体运到三十家子掩埋，便于解放后查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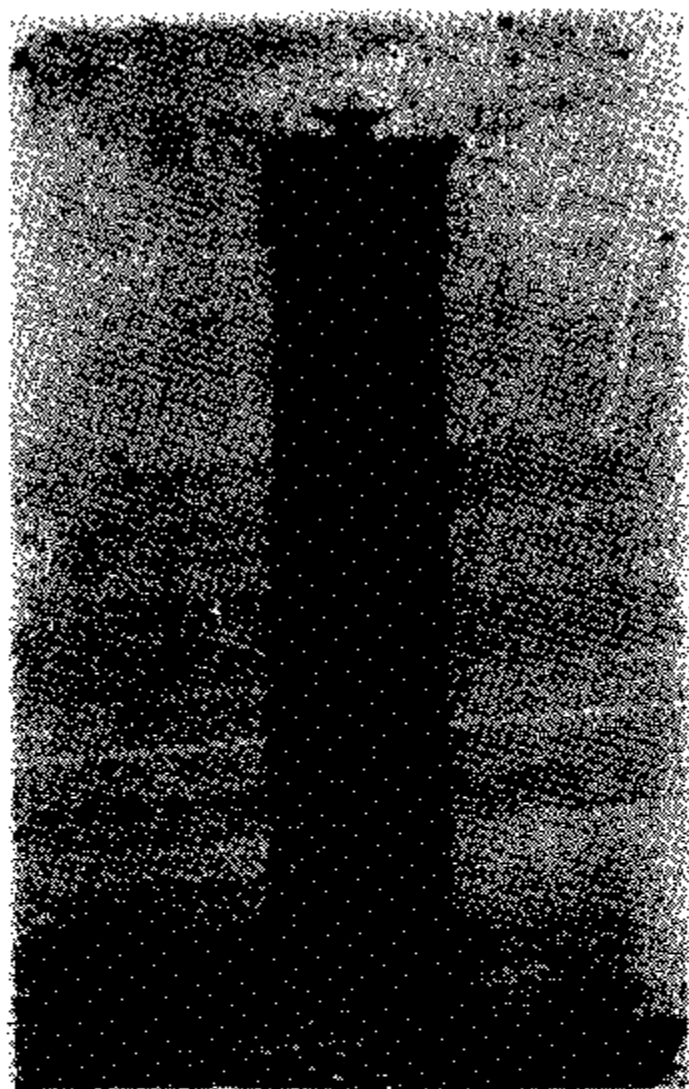
两天后，这位干部真把吉郑兴尸体送到吉淑贤处。尸体已用清水洗净，用白布裹着。经整尸发现从后背打进一颗子弹，从前胸穿出；从左太阳穴打入一颗子弹，从右太阳穴穿出。在整理吉郑兴的遗体时看出，在那艰苦的年月，革命群众对烈士的安葬是周到的，表达出了当地人民对吉郑兴的敬仰和爱戴。在三十家子又用棺木装殓掩埋了。全国解放以后，已将遗骨迁回家乡。

## 英灵永存

全国解放以后，乃林区党委和区政府主持，在乃林火车站前修建了一座雄伟、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上刻烈士英名，永志不忘。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我旗乃林区改为“乃林人民公社”。为了纪念先烈，曾把乃林以烈士吉郑兴的名字命名为“政兴公社”（把“郑”字改为“政”字），以示对先烈的缅怀。

（此稿一部分资料是原公安科长离休干部崔建舟同志和平庄矿务局工会主席离休干部李士英同志提供）





坐落在乃林车站附近的烈士纪念塔  
吉郑兴的名字列在原塔背面的最前面

张云岫搜集提供

---

## 世袭“引路侯”

邢复昌 木 斯

王爷府岗子杨家的封建地位，在本旗境内赫赫有名，远近皆知。因其祖上于清康熙年间受封侯爵，虽不是“乌梁海”、“塔布囊”，也是封建大家族了。延续二百余年，几乎与清庭相始终。

### 一、杨家功名的起源

清康熙皇帝一次秋狩于围场一带，发现一只猛虎，虎见人逃遁而去，皇帝亲自监督追寻虎踪。突然遇见一个蒙族青年，生得身材魁梧，膀大腰圆，手拉着一辆“勒勒”车（简单木棍制成），上山砍柴。康熙问他“虎逃向何方？”这个蒙族青年从来没见过这样阵张，这样威风凛凛的仪卫队！吓得惊慌失措，一只手将“勒勒车”举起，指向猛虎遁去的方向。康熙帝一见龙颜大悦，说：“此乃大力士也。”当即封他为：世袭“引路侯”。这个蒙古族青年名叫额勒夫孟赫，围场人，祖籍蓝旗珂垵。孟赫当即叩头谢恩。皇帝令其历年秋狩时前来接驾，并协助射猎。这真是“一言兴邦”。皇帝一句话给杨家奠定和形成了二百来年的封建势力。民国年间，当地蒙民称杨家为：“老虎后裔”。其实，并不是虎的后裔，而是由虎引起取得的爵位。

杨家世代依靠先辈孟赫给挣来的富贵，多年赫赫奕奕地过活。至清光绪年间杨家由敖大老爷（敖日伯）承袭爵位。但敖日伯嗜吸鸦片，挥霍无度，不理家务，几年间弄的仓库空虚，负债

累累，将杨树林、喇嘛地的数百亩土地都倒卖成“活契”，家境衰落。敖大老爷因用鸦片过度，中年卒死。敖去世后，则由其弟杨鼎臣（蒙名温哲琿）承袭其兄的爵位，人们称之为“杨大老爷”者，即杨鼎臣。

## 二、杨鼎臣家道中兴

青年的杨鼎臣，继承兄业，发愤图强。向当地关系比较深厚的大地主求援来弥补家庭之不足。二、三年内将其兄倒卖的“活契”地全部赎回，很快恢复了原业。

杨鼎臣，清同治年间生人，幼年学习蒙、藏文，很有造诣，自承袭爵位后，一直为贡王所器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在贡王创立的“守正武学堂”管理事务和学习军事，后曾被贡王选拔去保定“军官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回旗任“管旗章京”。与“协理”希里萨拉（后代理旗务，希中和之父），可谓贡王之股肱。至民国二十年后退居。

杨鼎臣中年丧偶，一直鳏居。有二子，长名时芳（蒙名乌勒巴图），次名运芳，有一妹妹嫁与本旗东部人张显廷；有个六弟在北京当喇嘛。杨鼎臣封建传统观念很深，性吝啬，家庭旧礼法很严。院内不准外人随意出入，雇用人盘着辫子、嘴里叼着烟袋入院都不准。帮青、扛活、雇用人等不准在姓氏上加“老”字。比如：姓“张”的不许叫“老张”。由于他的性格有些古怪，群众对他评价不高。平时他结交的都是上层人物，可以说，“谈笑皆权贵，往来无白丁。”

## 三、杨家的资产

杨家从康熙年间即成为喀喇沁王爷府的权贵。在距王爷府四华里的“岗子”建筑一所规模宏大的府第，面积有四十亩。分东

西两院，中间约有三亩面积的花圃。东西主院宽阔，修建了高大的滚龙脊厅房，筒瓦盖顶，府第门前竖有旗杆。主院的后面是家庙。西院是配院，面积很大，房屋不多。经过历代的建设，至民国年间，杨家的房屋不下百余间，黄土垛的围墙，高达一丈五尺左右，环墙周围及家庙后面，生长着圆径达二、三米粗的古老榆树，枝繁叶茂，遮云蔽日，树上长着绿油油的“冬青”，结出鲜艳的红果，每逢春暖花开季节，各类鸟儿争鸣高唱。

杨鼎臣一生好植树造林，在门前八十亩地周围栽上杨树。至解放时都是一围多粗的大树了。又在岗子东和下瓦房分界的地方，营建了三十亩的果树园，品种很多。至今老果树还有不少。

杨家在本旗东部旺甘池、建平县的王子坟一带有清廷赏赐租田四十顷（四万亩），依靠吃租子过活。民国初期王爷准许在王爷府一带开垦土地后，杨家占荒地面积最大，共有土地达一千五百余亩。过着安富尊荣、使奴唤婢的剥削阶级生活。杨鼎臣笃信喇嘛教，在历年正月初一请福会寺、善通寺的喇嘛数十人前来诵经，念“长寿经”、“太平经”等，至初六为止，意思是“消灾降福”。

#### 四、杨六喇嘛还俗与其兄析居分产

杨鼎臣之妹夫张文（字显廷，于宝衡的岳夫）系本旗东部人，一九二五年曾任北京蒙藏院总务厅长，很有政治地位。杨鼎臣对其妹夫可能有不恭之处，引起张对其内兄的不满。因此，张在北京怂恿其内弟六喇嘛（名忘记）还俗，并给其介绍对象，在北京结婚。婚后由张携带新婚夫妇来至杨家交涉分产事宜。杨畏惧张的势力，迫不得已将资产分给其弟一部分。同居一年，在上瓦房街东头，给其弟营造一所比较讲究的宅院，并将上瓦房数百亩土地分给其弟。六喇嘛有一子（名子厚）二女（翠雯、桂雯）。

六喇嘛早年去世，只有六寡妇育子女持家。

杨鼎臣于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病卒，年七十余岁。

## 杨时芳兄弟

木 斯

杨时芳，号子林（蒙名乌勒巴图），系杨鼎臣（蒙名温哲琿）之长子。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

杨时芳恬静寡言，为人正直。幼年在王爷府崇正学堂读书，后被贡桑诺尔布选拔入上海南洋中学堂学习。毕业后娶妻，生一女名梦兰（吴熙宪之妻）。不久妻生病亡故。

民国元年（1912年）南北政府正在对立时期，杨时芳同本旗的吴恩和、石子祥等人在南方政府（指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国会议员。后同本旗同学汪长春、于启明等人一起回到家乡。在当时来看是蒙族青年中比较先进的人物。

杨因原配妻室病亡，在广东期间又续弦汪氏（名不详），婚后在北京居住二年才回原籍。汪氏生三子四女。长子名德兆（少年夭折），次子德麟（吴鹤令之婿）去台湾，三子德钰（现在家务农），长女杨凤英，次女杨桂英，三女杨翠英，四女杨玉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热河。伪满时期，实施旗、县复合制（即旗、县并存），在王爷府设喀喇沁右旗公署，杨曾任过总务科长、警务科长等职务。邢宜廷代理旗长退居后，杨接任代理旗长至东北解放。

杨在代理旗长期间，对日本侵略者从不奴颜卑膝，办事公正，不徇私情，是较有民族气节的。例如：一九四一年冬日本侵

略者深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如火如荼，大有燎原之势，为了切断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通过旗公署作出了“集家并村”的规定，并召开了有关会议，使本旗五家、七家、旺业甸一带都遭此劫难。日本人原计划把王爷府、公爷府一带也划为集家并村区，经杨的一再反驳，终于使这两个地区的老百姓免受了“集家并村”之苦。

杨时芳虽出生在封建家庭，但与其父的性格、作为大不相同。在家休息时，总是到各耨青户家中走走，和贫困户畅谈农事，不摆官架子，见到耨青户的住房破旧，他就说：你们住的房子条件太差了，可以搬到院里（指大院）收拾间房去住，不要听老爷的（指其父）。因他不常在家，虽这样说也是办不到。但他的一番善意，在杨家耨过青的老农至今还念念不忘。

解放后，杨时芳由平庄回到家乡岗子，于一九四六年病卒，终年五十五岁。

杨运芳，号子森，系杨时芳之弟。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幼年在王爷府崇正学堂读书，又经邢宜庭给其补习汉文，在崇正学堂毕业后虽未升学，但汉文程度不低。毕业后未入仕途，一直在本地。

杨运芳成年后，本旗协理（管旗章京）希里萨拉年逾五旬，只有一女，尚无子嗣，便招赘运芳为婿，婚后住在岳父家，妻生子名德新。同年希协理之妾于氏生一子名中和（亿和夫），甥舅同岁。希协理老年得子，如获至宝，但对以后继承家产方面产生了顾虑。因此，动员运芳夫妇回归杨家居住，遭到女儿、女婿的反对。后经邻里中人给予调解，由希协理分给女儿一部分资产，运芳夫妇回归岗子，自己另建宅院。

运芳得到希协理给其女儿肥沃土地五百亩（在王爷府大营子、南马圈一带），又有希协理分给的一部分资产。在这基础

上，加之杨运芳夫妇二人治家有方，几年内也是富豪人家了。

运芳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修建住宅。在其父宅院东边，由其父给一部分房基地，又置买金姓一部分土地，合起来占地十五亩。又在王爷府西府破落拆房时买下木材、石条运回，由北京画来图纸，选当地能工巧匠修建了四合院，进出两层院落。外院是库房、碾房、饭房，东边是饲养牲畜之所。里院为住宅，正房、东西厢房、腰房均为五间。此外还有东西配房各两间。房子盖的高大而明亮，画栋，雕梁，小瓦盖顶，磨砖砌缝，迂回走廊，建筑精巧，富丽堂皇，在王爷府一带各大户的住宅中，可为一流。上院的东院，有马棚、牛羊圈、车库和大伙房等。有骡马二十余匹，大铁车两辆，轿车子一辆，牛、羊二百余头只。四周院墙高达一丈五尺，总占地面积四十余亩。

杨运芳在伪满时期曾任崇正国民优级小学校长职务，后由小王爷笃多博任为王爷府东大仓总管（东大仓，是王爷衙门管理事务的地方，堂号为积善堂）。杨担任总管五、六年，后因家务繁琐而辞去。

杨运芳夫妇对家庭教育很严格，妻希氏、妾于氏共生六子八女。长子杨德新，解放前任伪蒙疆政府蒙古军上校团长（乌古廷的妹夫）。“八·一五”光复后，在张家口起义，后转业阿尔山林场任林业科长。其余子女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

杨运芳于一九四八年迁居林东，后去阿尔山。一九六八年（文革期间）卒于锦山，终年七十五岁。



## 红帽子起事

王书平 张云岫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热河各蒙旗发生“红帽子”大起事，当地群众称之为“反红帽子”。

起事的原因是：蒙汉之间因蒙租发生矛盾。起初汉民开荒种地，是蒙民让出的牧场，汉民纳租，两厢自愿，各得利益。后来，年年出租，永无休止，汉人便认为蒙民是不劳而获。日久，地力减退，产量下降，租还是照数交，汉人更加不满，蒙民则认为对土地有自主权。收租是理所当然。水旱风灾，一律照纳。因此，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导致“红帽子”起事。

首先起事于敖汉。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金丹道在敖汉旗暗地设坛，发动群众，组织起事。法师杨悦春、李国珍等人设坛传法，习练刀枪。凡是入会的，都得不喝酒，吃素食。还宣扬加入该会的人，打起仗来，一上法“刀枪不入”，“撒豆成兵”，“墙上划门就能走”等邪法。更神乎的还有“板凳能当马骑”，“坐着炕席能驾云”。这些异端邪说，对当时落后、愚昧的群众来说是有一定欺骗作用的。

这次起事的宗旨：以金丹道教为名，打倒蒙古统治，夺取蒙地，免纳租税。因而提出：“学法术、抗满清、兴大明”一类口号。

热河地区以李国珍为首，自称大元帅，进攻北边各旗蒙古。进攻分四路：北路进攻赤峰、乌丹，先进攻敖汉；南路进攻建

昌，西路进攻平泉，东路进攻朝阳。于十月上旬，李国珍组织教徒以红巾裹头为记号，率众进攻敖汉，杀入贝子府，敖汉王全府人被杀，房屋变为灰烬。接着掀起全面大起事。

进入喀喇沁的“红帽子”，是由东部海棠川发起的。首领王殿发、李坤等率众向东进攻榆树林子、朱碌科；李符、独干子等人率众向西进攻奎德素、王子坟、甘珠苏庙（现在甘苏庙）。这一路进攻到甘苏庙后，烧毁小山上大殿八十一间，只剩下两座白塔和前边的天王殿，小山下的大庙亦尽烧毁，只剩一座七星楼。喇嘛大部被杀。接着顺老河川北下，杀奔高粱杆子店，山嘴子。

山嘴子村东王功是蒙民首户。八亩地院落，高大的围墙，四角有炮楼。兄弟四人，老三王功，老四王俭。海棠川一路逃来的蒙民多聚集在院内。有火炮之类武器，准备一战。“红帽子”涌到，包围大院，进行强攻。院中有所准备，一时难于攻破。晚间，王功家有一名做豆腐的汉人叫宋成，害怕攻破院子和蒙人一起被杀，就从大门缝隙中挤出，被“红帽子”抓获。他交待了院中的实力，火药存放的地点。“红帽子”把秫秸点着往院里扔，院里又把着火的秫秸扔出来。相持一段时间，院中的火药终于被燃着了。失去抵抗力之后，大门被撞开，“红帽子”杀进院内，人纷纷逃命，无处藏身就跳入枯井中，两口井人满，“红帽子”用石头压上，像渍菜一样。

王功的儿子王学彦那年三岁，其母亲抱着跳入井内，因人满，她们在上层，小孩哭声被“红帽子”听到，捅了一扎枪，把头部捅了一道沟，没死，活到六十多岁时，颈项上面仍留有一指多深的沟痕。几十年之后，老年人讲起这件事，尤能使人胆颤心惊。当时，交通极不方便，谣言四起，一会儿说：一千多“红帽子”从黑水方向来了（老哈河东岸重镇，建平县）；一会儿说：西南边的“红帽子”又过老哈河了。真是此处杀人，彼处火起，

惶惶不可终日。对妖术邪法也越传越神。

破山嘴子之后，“红帽子”沿大三家，直奔五枝箭（现属红山区），所向披靡，无御之者。取道楼子店的上烧锅一带。

此时的一些蒙民纷纷逃往西王府去告敌情。王爷府扎萨克一面差王府“福晋”太太到北京奏请清帝发兵救援，清帝遂派古北口军门叶志超带十营骑兵来围剿；一面派小府林沁呢嘛公爷组织骑兵向“红帽子”迎敌，以防“红帽子”攻入喀喇沁王爷府境内，遭受更大损失。

林公爷临时组织起蒙古壮丁和逃难青年共六、七百人，从小府起行，当日人马进驻公主陵十家。次日早起前往迎敌，行至头道营子便发现“红帽子”前队五、六百人。蒙古兵见“红帽子”呐喊连天，“杀！”“杀！”心惊胆惧，不敢前进。连带去的车轱辘火炮和大抬杆也点不着了。林公爷大怒，催马上前督阵，鞭督士兵点炮。炮响，有的“红帽子”被打倒、打死。蒙古兵亲见“红帽子”不是刀枪不入，没妖术邪法，更大胆用火炮射击，

“红帽子”败退。这里引出一个神秘的传说，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两军相遇，蒙古兵的大炮怎么点也不着了（当时火炮用药捻子点），“红帽子”喊杀连天，声势十分吓人。林沁呢嘛公爷大怒。骑马冲到大炮前，举起鞭子照准大炮就是三鞭，随即严令兵丁：“给我点炮！”于是大炮响了。大炮齐鸣，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大败“红帽子”。

“红帽子”失败后，又传出这样的故事：大炮齐发，一片红色烟雾，在火光中，就看一位金甲红面的人在火光中显身。因而说这是关羽显圣。林沁呢嘛公爷也就以为是关公显圣，助我一臂之力，大获全胜。所以，平定“红帽子”之后，回到公爷府在小府村东建关帝庙一座。庙内悬匾额一块，书“威灵显赫”四个大

字。

从以上两个带有神话色彩传说中，可以看出迷信在人们头脑中占有相当位置。实则是：蒙古兵被“红帽子”进攻的阵势震惊，心跳，手颤，连炮也点不着了。而“红帽子”呢，本来就敌不住拥有大炮的蒙古兵，失败是必然的。蒙古军迎着朝阳，炮火冲天，一片火光中显现出高大人影是光的折射所致，哪里会有什么关公显圣。

蒙古兵继续前进，到楼子店上烧锅一带，又大败“红帽子”大队。据老年人说，这一仗打死七、八百人。“红帽子”头目李符、独干子都被杀死。失去主帅，四散奔逃。得生者不过二、三十人。

相继王爷又派赵鹤亭率蒙古兵五、六百人与林公爷合击、清剿。凡参加红帽子的户，叫蒙古兵杀死不少，有的全家被杀。甚至被嫌疑的户，也挨了杀。这一路“红帽子”被平定了。

这时清廷也发来满洲骑兵若干营，分赴各地镇压“红帽子”，为防止再度起事，在各重镇都派清兵驻防。高粱杆子店有潘营，西桥驻有苏营。

“红帽子”本是“金丹道教”的一支起义军。但由于本身迷信落后，又把对蒙古王公统治者的仇恨，扩大到蒙古人民身上，杀害无辜，加深了蒙汉两族之间的矛盾，最后造成了民族之间互相惨杀的灾难。

为了把这一段历史说清，现将当时在这一地区设馆教书的河北省吴桥县刘宪章先生，依自己的见闻写下来的诗文录后，供读者参考。

十月十八（阴历）闻海棠川突起红巾贼向平泉老河川而来。

海棠花放小阳春，醉蝶狂蜂队队陈。

村落烽烟冲白日，虎狼首领裹红巾。

虚张妖术堪迷众，妄从先声欲夺人。

蝼蚁不安营穴事，行纵到处起风尘。

十月十九日见搬家逃难者很多，弟子各自回家。

车马门前势已分，漫夸笔阵扫千军。

先生有座成虚设，弟子无心敢乐群。

壮赴高山逃烽火，幼填深壑哭尘氛。

忠心父老沿途泣，犹把太平祝圣君。

二十日贼人过老（哈）河烧干苏庙，蒙古望风而逃，不逃就遇害。

荡尽海棠不肯休，老河两岸结冤仇。

山前纵火烧龙阁，殿上凌烟失凤楼。

性命逃时成哭泣，刀枪响处起歌讴。

遥登大火回头望，一片红云映泪眸。

二十二日闻山嘴子蒙古聚兵御贼，把逃出者都招回，严为守备。

死里逃生计策寻，同胞不若结同心。

长鸣鼓角兵威震，密比干戈义气深。

忠肃无劳司马剑，空城怕弄武侯琴。

先声到处肝肠断，窃料敌人未敢侵。

二十三日三家姜老爷的宅子被贼火焚烧，贼去，武扎栏统蒙古兵前来将看门的、做饭的及观望的人全杀死，完了统兵来“志兴永”烧锅酒饭而去，刀枪上血迹还在。

躬环甲冑握兵符，气象也堪社稷扶。

火烈昆岗听爆玉，令行春风唤提壶。

夕阳素铠全含紫，秋水青山半染朱。

海煮沙门方鼎沸，故将山水认虚无。

二十四日有六、七十红巾贼，有坐车的，有骑马的，有步行

的绕三家五枝箭向北而去，到处杀人放火，无敢与敌者。

旁门左道太无稽，可惜群黎半执迷。

朗朗青天悬日月，清清紫塞朵云霓。

奉天承运强为许，兴汉灭胡敢妄题。

大将巧运筹上策，从无仙语锡金泥。

二十五日有山嘴子蒙古来言，要去和贼兵打仗，回来在此吃饭。他们到下哈脑，与贼遇而败，死的死，逃的逃，均不敢来用饭。

武夫赳赳耀军威，欺敌轻心预计归。

临阵畏人枪莫举，高材捷足马如飞。

利兵有刃功无济，火炮连天势总违。

贼用火攻行伍队，风催余烬出重围。

未几武扎栏统兵遇贼亦败，夸其善战而笑其无用。

命中技能亦枉然，空闻火炮响连天。

但看逆贼排身进，不许官兵致凯旋。

酣战威催元帅令，横行势震老河川。

入门问孰奔而殿，共效祖先快著鞭。

二十八日贼破山嘴子，男女老少死者不计其数。

孤城坐守力难堪，火射云峰起翠岚。

满圈羊牛投饿虎，罄囊财物饱贪蚕。

刀头有命逃更五，血水成河染径三。

可惜西山观望者，惊心何日动归骖。

二十九日东方贼人到处放火。

火神得令下天庭，手秉火旗策火星。

火德盛时生甲乙，火牌到处起丙丁。

村边火树巢朱雀，户外火云列紫屏。

安得悟空持火扇，慈悲扑灭火山青。

十一月初二日，闻河东（老哈河）有贼千余人，裹蓝巾，执蓝旗，到黑水和巩大人要马匹、器械，巩大人不应。

红巾已过续蓝巾，气势汹汹步后尘。  
抗拒官兵夸胆劲，虚张妖术是传真。  
妄贪财物求为鬼，执掌兵符不让人。  
势寡料知难敌众，权为守备仰风宸。

十一月初三日西南贼无有真信，东北贼人又渡老河而来。

火烈坤方土有权，少男又遇丧朋天。  
追魂使者迷云外，炎上星君降日边。  
带来黄河辞黑水，血流白石咽红泉。  
伤心愿得中山酒，窃效刘伶醉后眠。

十一月初四日，为首的四、五人，执罗镜、看书籍、占六爻，有妖术附体，冒充帝君，皆虚而不实。不饮酒、不茹荤，口称“奉天灭胡”。其中有庄稼人、手艺人、买卖人和读书人。

四民可惜太愚顽，叛道离经若等闲。  
藐视王章夸异术，妄称天命入迷关。  
看书占卦凶为告，执镜照妖去作还。  
逆者高升应不远，鬼门指日唱刀环。

十一月初五日申时，贼众起营而去，住“大德泉”烧锅，晚间，听说潘大人统兵来打贼兵。听此消息者，没有不高兴的。

贼兵已去官兵到，引领倾心望太平。  
天上将军连日下，穴中蝼蚁一宵生。  
临渊解网问生路，入圣迷人枉死城。  
海水休将官漏续，明朝早得凯歌声。

十一月初六日午后，官兵至“大德泉”烧锅与贼人接仗，未用几个小时，将贼人尽灭。晚上官兵来“志兴永”住下。当天晚上公爷也领一千多蒙古兵来平扫“红帽子”贼兵，晚上也在

“志兴永”住下。

贼人头脑太冬烘，误认官兵入道同。

逆者卦占全不验，将军马到已成功。

墙头火炮烟飞白，户外刀枪血染红。

遥听凯歌民尽悦，旌旗招展夕阳中。

以上诗文系王书平同志供稿，他是据书面记载的材料而写的。我们不必评论其诗文的风格、韵律如何，但从其内容以及作者的感情、认识上，对了解“反红帽子”这一历史事件有一定参考价值。



# 善通寺

阎桂芳

“善通寺”位于喀喇沁旗王爷府镇下瓦房村北山麓中，距旗所在地锦山镇三十四华里。古刹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至六十年（1794）间。也就是喀喇沁右旗第八代世子满珠巴咱尔，在乾隆五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乾隆五十三年清廷恩赐亲王品级，满珠巴咱尔皈依佛教，笃信喇嘛教（藏传佛教），故不惜耗费巨资修建了“善通寺”。

据八十二岁老人马文成（梵名：确普喇呢）回忆，他八岁（1912年）入召庙，从下瓦房进入善通寺沟门，即可望见谷壑两侧布满粗大的古榆，西坡柞树满山，东坡杏树成林。寺庙内约有三百多棵山梨树，叫“梨树洼”。还有“桦树洼”、“椴树洼”。沟里砬子底下有四棵大榆树，人们称为榆树甸子。山泉水长流不断，上下共有九个泉眼。北山的三峰（山崖）是三座菩萨啊！在东庙下台子上，建有亭子一座，还摆着石桌、石凳，旁侧栽有“阿古如”（杜松）一棵，是康熙皇帝阅边时栽的。据《清实录》记载：是玄烨（1698年）去盛京（今沈阳）谒陵祭祖巡幸边疆，在此地搭帐幕驻蹕，建亭子，栽杜松，以示训忱。在亭子东侧山坡上有“黑老婆条子”（乔木），一围粗、两围粗的大约有三百多棵，老乡称它为“山丁香树”。

善通寺的五座召庙都依山而建。古刹和喇嘛住宅组合成一个整体。

各寺的建筑艺术：

(一) “大雄宝殿”，原名“康宝寺”，是三进院落。山门三间建筑在五尺高的月台上。山门走廊两壁上描绘着守护法佛二天神（俗称：哼哈二将），左称“密制金刚”，右称“那罗延金刚”，画像裸体，缠衣于腰部。二层殿三间，中间走廊右壁上为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升佛图像，描绘细腻，线条流畅。左壁上描绘着敌对战争图，上有雷公闪电之状，下有大象拉着大炮。从二层殿到大雄宝殿都是石条甬路，院内方砖铺地。“大雄宝殿”是二十五楹的二层楼建筑，歇山，飞檐翘角，昂首凌空，四周重檐，双层斗拱，顶装有宝刹、螭吻。殿堂上层中间供奉“大悲金刚”佛，亦称千手千眼佛或四十二臂佛；东间供奉三世佛——燃灯、释迦牟尼、弥勒佛；西间供奉的都是两米高丝绣佛像，其中有康熙第五女端静公主从京城带到驸马府以后赠奉给善通寺的“度母”佛像，也有慈禧太后赠奉的佛像。楼下大殿内主尊佛“释迦牟尼”、“宗喀巴”都是五尺高的铜佛，两侧有几十座铜佛，其中有“伽兰神”七尊，“度母”二十一尊，“转世灵童”数座，雕刻精细生动，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供品、供器陈设华丽，七珍、八宝都很精致，油酥花尤为精彩。

(二) 满大林（藏语：占巴），是阁式五楹殿，建在悬崖峭壁之下，铺有花岗岩石条台阶十级，四十八根石柱栏杆，每石柱上雕刻着一个石虎，形态各异。院内建有小型钟、鼓楼。室内供奉八尺高的主尊佛“满大林”（汉语：未来佛），两侧供奉三尺高的十八罗汉。造形生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三) 阿弥陀佛庙，建在东坡上，是三进院落，三院依次有石条台阶八级、十级、十二级。主殿供奉“阿弥陀佛”，即“大悲金刚八臂佛”，八尺高，有十三个头面。西侧供奉二十一尊“度母”和长寿佛，东侧供奉十八罗汉。东西配殿各三间，供奉的佛

像很多，不知其名。

(四) 舍利塔庙，两进院落。山门用花岗石拱成，正殿设有九尺高、直径三尺五寸粗的筒状木制“嘛呢轮”，上镌刻着“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箴言（汉语：南无量佛），上面嵌着一千个“阿弥陀佛”铜片佛像。筒内装有三千六百五十万个六字箴言纸卷，旋转一周，等于念十年诵佛名教。每逢庙会，善男信女手持“素珠”虔诚叩首，旋转“嘛呢轮”一周。实际是属于大乘教净土宗（派）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极乐世界）的信仰。

院中有五尺高的石碑两方，其上镌刻蒙、汉、满、藏四种文字，记载了清同治四年重修庙宇的情况。

在室内筑有五尺高的主坛，上供奉三个时代的“国穆活佛”塔（内装骨灰）。第一世“国穆活佛”是第八代郡王“满珠巴咱尔”之次子（梵名：喇嘛布仁勤），十七岁入西藏“扎木阳喜特格”召庙学习经文，二十岁回善通寺，六十五岁圆寂于此庙。他的骨灰一部份送往五台山，一部份留在舍利庙装入五尺高的花岗石雕刻的石塔中；第二代“国穆活佛”是汉族，陕西人，叫“马再”，十四岁被请到该庙“转世灵童”，六十一岁圆寂，他的骨灰装入三尺高的铜制佛塔中；第三代“国穆活佛”是青海人，藏族。因与主持喇嘛闹纠纷，给活佛扣些污秽之词，说他有隐私，气得活佛在三十五岁时离开“善通寺”，去东北洮南，据说在“双流寺”，四十五岁圆寂于洮南。一九四一年七月将骨灰运回一部份，供奉在舍利庙中。给他用“色柏”做的塔，是下瓦房村乌力吉巴图木匠做的佛塔，马文成绘的色彩。

所谓佛的舍利是梵语，火葬佛骨米粒结晶。“舍利”仅仅是骨灰。

(五) “噶根宫”位于大雄宝殿西侧，是三进院落。宫前铺

有石条台阶，房舍既清静又壮观，院内种植各种花草，给人们一种古雅、清秀之感。

善通寺由于是喀喇沁右旗扎萨克第八代郡王所建，人们称之为王爷的家庙。其次子“喇嘛布仁勤”清廷加封“转世灵童”。所以该寺在建筑上富丽堂皇。佛像、供器、法器绝大多数都是铜、银制的。该寺权势大，所分配和布施的香火地超过全旗六十多个寺庙的任何寺庙。由于经济实力雄厚，所以供品也较丰盛。仅燃海灯和制做油酥花用油一项，每年达几百斤。

善通寺由五个召庙组成，各个寺庙都进行法会活动，但举行的内容、形式不同。仅“大雄宝殿”举行的大型法会活动就规定每年一百二十五天。在法会活动期间，接受善男信女舍施的整猪、整羊和成袋的面粉不计其数。

祭祀“卡吉得玛”所举行的步扎：

(一)“卡吉得玛”由来：格西曲扎著《藏文辞典》附汉文注解九十七页中记载：“天空行(即干闥婆)，观自在‘菩萨’。所谓的天神名叫‘喀萨跋呢’(菩萨名)。”《甘珠尔经》第十四部上说，从原始社会就有这一消灾的不属佛类的佛。她是驱邪除恶，护法天女。

(二)跳步扎(藏语：查玛。蒙语：步扎。汉族多数人称为“跳大鬼”)：跳步扎主要有三种形式。1、大部份寺庙主要跳镇压西藏第九世藏王“朗达玛”而举行的步扎(如福会寺、灵悦寺、宏福寺、吉庆寺、甘苏庙)；2、请天神的步扎(王爷府积善生乐寺)；3、举行祭祀的步扎。善通寺祭祀“卡吉得玛”的步扎。全国极小数寺庙举行这类步扎。据说第一世“国穆活佛”在西藏学习经文，回寺时带回一部“卡吉得玛”经，同时带回她的画像。由此开始举行祭祀“卡吉得玛”的步扎。

(三)“卡吉得玛”的形象；善通寺举行祭祀悬挂的“卡吉

得玛”的画像有两幅，大的有六尺高，小的二尺高。画像的形态：一男“德木其格”赤身裸体站立，“卡吉得玛”也是裸体，身上缠几串素珠，他俩拥抱在一起，两嘴在接吻，是裸体双身像，俗称：乐王佛。

（四）祭祀的主要形式：每年农历正月初十、四月初十、七月初十、十月二十五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余二、三、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初十只诵“卡吉得玛”的经文）。开始由值班喇嘛把“卡吉得玛”画像悬挂在“大雄宝殿”内，摆上供品，点燃海灯，喇嘛们相继开始诵“卡吉得玛”经。上午十一时左右开始祭祀活动：先由八名青年喇嘛化妆，头饰仙女似的发髻，身着五色裙子，足蹬彩色绣花靴子。两个穿红色、两个穿黄色、两个穿蓝色、两个穿绿色的绣花锦衣，表示八位天女来祭祀“卡吉得玛”（据老人传说，西藏由十六岁少女化装祭祀）。乐队伴奏，跳跃起舞，随之，诵经高吭，依照祭祀舞蹈形状有节奏的变化而变化。扮演者手持玻璃器皿，表示从四海提来圣水，给予“卡吉得玛”净面、身、手、足，去掉污秽，随之供奉高香、海灯以及七珍、八宝、衣料等等。

举行一次祭祀活动，善男信女和游览者肩摩踵接，络绎不绝，买卖摊贩也随之而来，形成一场盛大的庙会。

## 锦山镇清真寺

马 贵 祥

锦山清真寺位于喀喇沁旗锦山镇老街东头，占地面积约五亩。

锦山清真寺始建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那时锡伯河无堤坝，光绪年间发洪水，把清真寺冲毁。

锦山有个回民白秀才，曾教喀喇沁王学汉文。后来死在北京。王爷就按汉族葬礼把他装在棺材里，过热河时，回民们把棺材两头锯掉，改成“塔布”，用驮轿运回，葬于锦山嵩松沟四把伙的东山坡上。白秀才死后，他的老太太回了山东，就把他们的住宅作为拿“包贴”（意思是行好事，作贡献）献给锦山回民，做为清真寺址，就是现在的清真寺。

锦山清真寺为两层院。外院有大门洞，四周是土筑大墙。二门是四步高台阶，上着海式门，正面悬挂一块蓝地金字长匾，四个大字“万华朝真”。二门以内是四门斗房子，都是青砖青瓦，土木砖石结构。正面是三间大殿，滚龙脊房子，在脊中间有风磨铜顶，铜顶座下，正面有个圆镜，镜两边是两条龙，名曰“二龙戏珠”，脊的两头是两个龙头。房子两边也是滚龙脊稍，上面雕塑着螭吻。稍头上又雕塑着龙头，龙头下面挂着惊雀铃。前面砖垛中间两个窗户，一个圆型八棱木质窗，一个是半圆型木质窗。中间是四扇格扇门，门上雕刻精美图案。中间前又修个抱厦，抱厦也是起脊的，抱厦的两边稍，像大殿一样，雕塑着螭吻、龙头，

也悬挂着惊雀铃。上六步台阶进月台，周围用石条砌着，中间方砖铺地。抱厦横梁上画着热河八大景。东西横梁上，各悬挂着两块长匾，刻着历年维修清真寺捐献粮款数目和人名及年号。

三间大殿明着，里边只有“敏白雷”、带龙头的“阿刷棍”（念呼图自用），西墙上用白灰抹出一个门，上面写着“台斯尼”（阿文，意思天堂门），有木质香炉架和瓷香炉，还有“开合付”（经名）。木板铺地，木板上铺着席子和毡子。

东西各有三间厢房。东厢房北头一间是阿訇住屋，也是阿訇念经、讲经堂，屋里有《古兰经》《乜帖》《亥帖》等经卷，并悬挂着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央访问团赠送的绿色锦旗，锦旗上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南头一间是沐浴室，供穆斯林沐浴用，室内设有“勿斯圈”和洗脚池。回民沐浴是淋浴，用漏罐和“汤瓶”（水壶）。中间一间，是沐浴烧水地方。回民群众有红、白事或祭祀作礼拜时，必须先进行沐浴。西厢房三间，北头一间是架子屋，停放发送亡人用的“水流子”和“匣”。南头一间是客房，供来往路过的阿訇或穆斯林住用。中间一间是灶间，回民群众集体庆祝三大节日时用。

三大节日：

“尔代节”，俗称“大开斋”，每年伊斯兰教历九月为斋月；“古尔邦节”，于大开斋节后七十日举行，俗称“小开斋”；“圣纪节”，伊斯兰教历三月十二日为圣纪节，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誕生日，又称“圣纪”。在三大节日上殿礼拜念“古兰经”，礼拜作“佛理采”或“损乃太”。

按伊斯兰教义规定：每日五个时辰都应做礼拜，俗称“五功”。即：“巴木达的”（早晨不出太阳之前）；“撒石尼”（下午十二点半至两点）；“底盖礼”（太阳压山不落）；“沙母”（太阳没的时候）；“虎福滩”（天漆黑时）。在礼“五功”

时，念“讨白经”，意思是给死的、活的求吉利。

清真寺院内有果树和花草。在四合院外，东西各有一块菜园，共计二亩。四周有大榆树，长着“冬青”，环境非常幽静。

但在十年内乱中，破坏得破烂不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从一九八〇年以来，历年拨款维修，现已把东西厢房修好。目前正在准备维修大殿和二门，使清真寺恢复原貌。



## 洞山庙的来历

王书平

洞山，原名“遮盖山”。位于牛家营子镇西北部，距牛家营子镇四公里。此山处于喀喇沁旗与赤峰县（现郊区）交界处，海拔七百公尺。在此主峰山半腰间有一寺庙，名曰“灵峰寺”。此庙的历史过程，根据碑文和零星史料考证，这座石窟寺是辽代乾统二年（1102年）创建。金代皇统三年（1143年）重修。此庙主殿是山洞，因此，当时人们都管它叫“洞山庙”。建庙的开始时期，据说金代有一玄都大法师，来此山凿山成洞。共开凿三个石洞，中间主洞是“灵峰寺”大佛殿，洞口上边有“灵峰寺”三个大金字。洞中有石雕大佛像一座，身高三米五，两面有两个石雕罗汉，立于大佛像两旁。在主洞两侧又开凿两个通气的石洞（山一洞口进去，另一洞口出来）。洞壁上开凿一千多个小石窟，每一石窟有一尊小铜佛像，此洞名曰“千佛洞”。此庙建成后，历有住持僧人很多。据说在明代，此庙有一老僧，名叫黑和尚，是当时该庙名高德重的圣僧。有一天这个黑和尚，突然不见了，众僧人遍处寻找，后在该山南面沟底下一个石炕上，找到了他的尸体，解其衣而观看，肚皮上书有“羽化成仙”四个字。就传说这个黑和尚脱凡胎而成仙了。该庙由金到明代，遭过兵、火、抢三次大劫。因此，到明朝万历年间重修一次。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又重修多次。工程最大的是万历年间的那一次。到清末民国初年，有老和尚名叫源荣，中年和尚名叫广钵，小和尚两名：续

刚、续直。庙有香火地很多，每年打七十多石粮，饲养牛羊若干头只。每年庙会是阴历四月初八日。到庙会这天，不但有东西两川人来赶庙会，承德、北京等地也有很多人到此游览。并有英、法等外国人，也借此庙会机会传教（基督教）。解放后，该庙老和尚广钵已死，小和尚“返俗”了。于是该庙由衰落逐渐遭到破坏。一九六四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洞山石窟寺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现在除主洞有一石雕大佛像残存外，其他神像和建筑物，已被破坏。现在人们只能看到一些残迹遗痕。

## 喀喇沁旗寺庙简况

喀喇沁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地区。由于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如汉族信奉佛教和天主教；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蒙古族信奉喇嘛教。

清宣统年间全旗有僧众二千一百多人。全旗有大小寺庙六十余处，这些寺庙多数建于清朝。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建造出如此规模宏大、雄伟富丽的寺庙，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寺庙为研究我旗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等，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

### 喇 嘛 召 庙

#### 极乐隆兴寺

位于大西沟乡庙沟里。建于清康熙年间。兴盛时期有喇嘛五十余名，主持喇嘛吐观葛根死后，由“于大喇嘛”代主持喇嘛。庙仓有土地三百亩。“文革”期间拆毁。

#### 福会寺

位于王爷府镇西南一公里的大庙村。始建于康熙年间。是王爷的家庙。全盛时期（乾隆年间）有喇嘛四百五十余人。主庙五层殿。西侧建有“生乐寺”，东侧有“显应寺”，均属福会寺的附属寺庙。

### 极善生乐寺

位于王爷府镇福会寺西。伪康德三年（1936年）失火烧毁，同年由福会寺庙仓又重新建起大殿三间。供有千手千眼佛。住庙喇嘛三十余名。有香火地二百余亩。解放后这座庙没有破坏，现在是宗教活动点，由王色仍喇嘛主持，每年都定期组织喇嘛举行佛事活动。

### 威应寺

位于王爷府镇福会寺东。俗称噶根庙。活佛长赛噶根的家庙。有徒弟二十余人。长赛噶根系此庙的三世转世活佛，一九四一年死后葬于庙沟。其徒弟延旦扎木苏管理庙事。有香火地四百余亩。解放后此庙被粮库占用。现仅存部分房屋。

### 广慧寺

位于王爷府镇威应寺（噶根庙）东边。大营子于华亭（于二爷）的娘家庙。于还俗后由四爷喇嘛（名字不详）主持。有喇嘛三、四人。香火地八十亩（福会寺前边桑树园）。现存。

### 延庆寺

位于王爷府镇。民国年间拆除。

### 善通寺

位于王爷府镇下瓦房村北沟。建于乾隆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1787年—1794年）。有五座召庙依山而建。是第八代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耗费巨资修建的，本庙的建筑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十分秀丽。毁于五十年代。现无存。

### **龙泉寺**

位于锦山镇西北狮子崖下。始建于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重修。呈三进三阶院落，前有山门，中有天王殿和东西配殿，后有大殿三间，殿前石阶下有一大型石狮。寺后西侧有古井一眼，名曰龙泉。该寺至今已六百余年。兴盛时期是元、明、清三代。于一九八六年五月被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维修现状完整。

### **吉庆寺**

位于锦山镇西府村西。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喀喇沁第三代郡王噶勒藏和硕额附的家庙。兴盛时期有喇嘛一百余人，香火地七百余亩。一九五八年拆除。

### **灵悦寺**

位于锦山镇街中路北。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二百余年。原寺占地四十余亩，建有经堂、佛殿一百余间。兴盛时期有住庙喇嘛五百多名，是全旗大型寺院之一。现在是全旗保护最好的寺庙。现由旗文物管理所管理使用。于一九七六年列为旗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金华寺**

位于锦山镇灵悦寺西。建于清代中期。末代主持喇嘛确日格（七世转世喇嘛），其徒弟桑巴拉扎布（朱宝玉）现年八十一岁。兴盛时期有喇嘛三十余人，香火地二百余亩。现正殿残存，由锦山镇政府占用。

### 花墙子庙

位于锦山镇街中心（现水利水产局院内）。系金华寺附属庙。盛时有喇嘛七、八人。现仅存正殿三间，旗水利水产局占用。

### 康宁寺

俗称小大庙。位于锦山镇街西，建于清代中期。主持人王大喇嘛（名昭如）。兴盛时期有喇嘛二十余人，香火地一百余亩。现正殿残存，由土产公司占用。

### 宏福寺

位于龙山乡牛头沟门村。建于清康熙年间。兴盛时有喇嘛二百余人，香火地三百余亩。系小府林公爷（林沁呢嘛）的家庙。一九五八年拆除（现牛头沟门变电所处）。

### 涌泉寺

位于牛家营子镇水泉村。建于清康熙年间。有佛殿九间，院中心处有一喇嘛塔。兴盛时有喇嘛百余名，香火地百余亩。主持喇嘛扎木苏。现正殿残存。

### 吉畅寺

位于马蹄营子乡大三家村。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山门三间供四大天王。门前有旗杆一对。后殿五间供土观佛（活佛喇嘛）。据说：光绪十八年（1892年）土观喇嘛转世到此（13岁）。正殿供有千手千眼佛、金刚佛、欢喜佛、十八罗汉等。其他房屋三十余间。有常住喇嘛三十余名，香火地两千余亩。现无存。

### 法显寺

又称甘珠苏庙，俗称甘苏庙。位于乃林镇甘苏庙村。建于清康熙年间，是我旗大型寺院之一。兴盛时有喇嘛五百余人。一八九一年“红帽子”（红帽子系金丹道教一支）起事期间烧毁。晚清时又进行重修。本庙毁于解放后的五十年代。

### 普云寺

位于乃林镇北山根雁翅庙村。建于清康熙年间。今无存。

### 福吉寺

位于十家满族乡头道营子村。建于清代中期。有三层殿。解放前有喇嘛十余人。今无存。

### 太平寺

位于大牛群乡小庙子村。建于清代中期。今残存。

在大牛群乡大牛群村南营子，小牛群街里各有一处喇嘛庙。今无存。

## 寺 庙 观 堂

### 灵峰寺

俗称洞山庙。位于牛家营子镇西北六华里的遮盖山上。辽代乾统二年(1102年)建，金代皇统三年(1143年)重修。在山腰中间有七个石窟，分别称为和尚洞、长工洞、碾子洞、娘娘洞、主洞、环洞、老爷洞。在主洞门顶上嵌有“灵峰寺”三字石匾。此洞又曰“千佛洞”。清末主持和尚源荣，有中年和尚两名，广钵

和广训，小和尚续刚和续直。香火地三百余亩，打粮七十多石。有骡马大车一辆，牛羊二百余头只。该寺在“文革”时破坏。现残存的石窟中尚有石佛一尊。

### **普广寺**

又名降干图。位于马蹄营子乡山嘴子村。有大殿两层，占地约十余亩。前殿供关帝，后殿供千手千眼佛，两侧供十八罗汉。东西配房各五间。光绪二十年重修过。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为和尚主持。有香火地千余亩。寺内常住和尚四、五人。今无存。

### **孤峰寺**

位于马蹄营子乡孤山子村。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山门三间（马殿）、后殿五间供关帝、文昌、圣佛、娘娘、药王。配殿各三间供九神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重修。占地十余亩。香火地一百余亩。一九四〇年铸铁钟一口（现存）。寺无存。

### **锦山镇清真寺**

原位于锦山镇老街东头。占地约五亩，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十八年被洪水冲毁。后迁于后街回民白秀才的住宅处（现清真寺）。有两层院，大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共九间。现东西厢房已翻修一新。

### **上瓦房关帝庙**

位于上瓦房乡上瓦房村。大殿三间，中供关羽、东供娘娘、西供药王。门殿三小间，两边各有一马童。由金太喇嘛主持。门殿前有小型戏楼一座，建于民国年间。“文革”前拆毁。



### **下瓦房关帝庙**

位于王爷府镇下瓦房村东头。坐东朝西，正殿三间供关羽，南北配殿各两间，南供娘娘，北供玉皇。门殿三小间，两边各有马童。主持和尚两人，门前有旗杆一对。广场有戏楼一座，建筑雄伟壮观，是全旗最大的戏楼。“文革”前拆毁。

### **锦山镇河南西关帝庙**

位于锦山镇河南西村樱桃沟门。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公爷后裔乌古廷的家庙。坐北朝南，前有马殿，内有钟鼓二楼，东西配殿各三间，供有娘娘和九神，正殿三间供关羽。庙东墙外有石塔一座，据说在里面埋葬着历代和尚的尸体。本庙毁于一九六七年。

### **锦山镇河南东关帝庙**

位于锦山镇河南西村东台子地。建于民国年间。是林公爷（林沁呢嘛）的家庙。有正殿三间内供关羽，东西跨屋一面一间，西供九神，东供娘娘。东西各有配殿三间为僧人宿舍。门殿三间内有马童。有住庙和尚四人，香火地二十余亩。一九六四年拆毁。

### **小府关帝庙**

位于锦山镇锦东村老太太后沟口。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系小府林公爷的家庙。解放后被洪水冲毁。

在美林乡、旺业甸镇茅荆坝顶、两家村、四十家子乡罗家营子村、龙山乡西后街、西桥乡街里、楼子店乡锅底山下等地均有关帝庙。今无存。

### **药王庙**

位于牛家营子镇王家营子村。建于民国年间。主持和尚广逊（上瓦房家），有徒弟二人。总管王振祥。香火地一百余亩。本庙毁于五十年代。

### **财神庙**

位于锦山镇街中心现旗幼儿园院内。建于民国年间。是公爷府街各商号集资修建的。现残存正殿三间，被幼儿园占用。

### **娘娘庙**

位于龙山乡龙山村北山湾处。建于清康熙年间，重修于乾隆年间。有正殿三间，石碑两方。毁于五十年代。

### **玉皇庙**

位于楼子店乡玉皇庙村。今无存。

### **圣佛庙**

在锦山镇街西（现旗医院处）、龙山乡街西头各有此庙。均建于伪满晚期，毁于解放初期。

### **宝神庙**

在龙山乡街东头、牛家营子镇大碾子村（西大碾子）河边各有此庙。今无存。

### **双龙观**

位于昌盛远乡。始建于道光元年（1821年）孟夏。主持人刘治霞。后来由金火道人主持。盛时有和尚十余人。正殿三间，两边

各有配殿两间，正殿前边两栋和尚住房，正殿三间供关帝，配殿供“十不全”、鬼王、九神。今无存。

### **宣讲堂**

在昌盛远乡双龙观东侧有一处宣讲堂。共有房屋二十余间。有悬山、佛像。盛时有和尚十余名。现只残留大铁钟一口。

在锦山镇樱桃沟村有宣讲堂一座，建于伪满康德三年（1936年）。今残存。

在楼子店乡二道营子村有宣讲堂一座。现无存。

### **牛头沟门天主教堂**

位于龙山乡牛头沟门村。一九一一年由外国投资兴建，属欧洲哥特式风格。占地面积一万三千二百平方米。有大堂七间，内有两座祭台。堂外有七间房屋为神职人员居室。西跨院五间为婴孩院，最盛时婴儿达五十余人。教堂后面有四亩菜园。该堂归赤峰主教府管辖，开始由外籍神甫担任本堂，后由中国神甫担任本堂，最后一位神甫是张明。该堂兴盛时有教友二百余人。解放后改做小学。现教堂残存。

### **金家店天主教堂**

位于旺业甸镇金家店村。建于清代晚期。解放后改做粮库。

### **二道营子天主教堂**

位于西桥乡二道营子村。建于清末民国初年。解放后改做学校。

在上瓦房乡银匠营子村有一处天主教堂。现残存。

在四十家子乡团结地村大东沟、桥头湾子村、驼店乡小梁子山坡、大牛群乡大营子村后沟、郭波沟村西三家、小牛群乡小木匠营子村、黄家窝铺村、南台子乡官村沟村、北山根村、十家乡石灰窑村等处各有一庙。均毁于解放后期。

木 斯 张云岫 郑瑞峰 张 勇整理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3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